

研讨实录

第 105 期

105

沈志华、沈定昌、千辰煥：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解
解读和应对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新情况
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八年三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昭'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135期沙龙——沈志华、沈定昌、千辰焕三位先生共同作的题为“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解”的演讲，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发展》杂志社共同举办的2018年系列座谈会第1期“解读和应对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新情况”和第2期“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沈志华，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沈定昌以及韩国金九财团副理事长千辰焕三位先生共同作了关于“朝核问题”的演讲。沈志华教授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谈了中朝关系的演变过程。总体来说，中朝友好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达到顶峰，在邓小平时代逐渐发生转变。以前，由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地缘安全的一致性共同促成了六七十年代的中朝友好关系。后来，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中朝关系的转变。沈定昌教授则从朝鲜核试验的发展和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的内外因素展开了论述，提出我们

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朝鲜问题的大方向来把握朝核问题。千辰焕先生谈到韩国和朝鲜打交道多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朝鲜已经拥有了很好的核武器。再这样下去的话，韩国对朝鲜也没有一点办法，互相之间会越来越麻烦。

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最近出现一些新情况。从特朗普总统在 APEC 峰会和达沃斯论坛的演讲、美国国情咨文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来看，美国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此外，除美国以外的 11 个国家已就 CPTPP 协议基本达成了共识。究竟如何准确解读上述新情况？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会向哪些方向发展？我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基金会与《科学发展》杂志社共同举行座谈会“解读和应对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新情况”，专门讨论了上述问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兼副会长乔依德，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冯军，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研究员姚为群，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张立平等嘉宾先后进行了发言并讨论。与会专家认为：首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求是“不对抗”；其次，我国要将外部的压力转化

为内部改革的动力；最后，推进国家战略要“稳中求进”，“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的格局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例如，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设定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未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进一步正常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愈发复杂的外溢效应冲击？我国在“双支柱”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如何协调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基金会与《科学发展》杂志社召开座谈会“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探讨以上问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知仁，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剑平，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总部研发部总经理闫彦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李蕊等嘉宾先后发言并讨论。面对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原来积累的风险可能在新阶段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不是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最好窗口期，但可以适当开放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对于人民币业务，可以“先做起来，但不宣布，摸着石头过河”。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目 录

沈志华、沈定昌、千辰焕：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解.....	1
解读和应对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新情况.....	31
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	53

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解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

沈定昌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千辰焕

韩国金九财团副理事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35 期 2018 年 1 月 17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今天我们演讲的主题是“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解”。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演讲嘉宾，先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传奇故事。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如果大家比较关心历史，或者对时事问题有所了解，那么对沈志华教授应该不陌生。他的学术道路是与众不同的。他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肄业。后来下海经商赚钱，但他依然对学术念念不忘。他去了俄国，那时候苏联解体，有很多档案限时开放，他花了大量的钱把很多档案复印了拿回来，然后自费请专人对这些材料进行翻译和梳理，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这样一种精神，是非常难得的。请沈志华老师到华师大担任教授，上海这件事是做对了。沈教授对周边国家很有研究，并且成立了一个周边国家研究院，由他担任主要领导。让我们再次对他能来这里演讲表示感谢！

第二位演讲嘉宾也姓沈，叫沈定昌。大家对这个名字可

能不太熟，但是我一讲大家应该也会有亲切感。他是我们上海的知青，文化大革命到吉林延边插队落户，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北京大学学朝鲜文，毕业留校后，赴朝鲜进修两年。之后，国家教委借调派到朝鲜当了好几年外交官。我们和韩国建交以后，他作为访问学者去韩国，也待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同时，在职到韩国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了这样的经历，沈定昌先生对南北韩的各种情况，必定都非常了解。我们也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第三位演讲嘉宾是来自韩国的千辰焕先生，千先生的经历也是非凡的。在上世纪 60 年代，韩国出现学生运动，他当时作为五个学生代表之一和朴正熙谈判，为此，前几年还得到一个韩国政府颁发的民主化勋章。60 年代，他在台湾政治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在美国学习拿到了博士学位。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拿到了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他的朋友说，从 80 年代开始，千先生已经到我们中国来了 500 次，因为他曾任韩国 LG 集团中国地域本部长常驻中国。千辰焕先生的经历是非常不平凡的，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欢迎！

关于朝核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去年的气氛也很紧张。最近南北韩进行了谈判，可能会共同参加平昌的冬奥会，看上去气氛有所缓和。但是这种缓和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朝核问题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并不是转折点，因为以往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数次？鉴于此，我想今天请三位嘉宾演讲，给我们带来启发。下面我们先请沈志华教授给我们做演讲。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

家研究院院长)：我不直接讲朝核问题，一会北大沈教授讲，他是搞现实问题研究的，我讲我的专业，讲历史问题。究竟朝核问题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和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很多信息没掌握，很多情况也不了解。但是国家决策部门要做决策的时候，倒是应该听听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对整个这个历史过程进行了非常认真仔细的梳理，我们能知道从 50 年代一直到 90 年代中朝关系的走向是什么，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趋势是什么。这样可能有助于国家的决策，包括沈教授他们做现实研究的，也应该以我们历史研究为基础。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出了中文版、韩文版、日文版，但是出在香港，我是没有拿到。我好不容易买了一本，还是盗版的，因为香港不让带进来。那本书里面，我主要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朝关系，从 1945 年二战结束，一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中朝关系到底怎么变化的，中朝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今天就不讲了，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讲我新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朝关系，这个时候中朝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怎么变？接下来我简单勾勒一下。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位，就是冷暖无常，变化曲线非常大。从朝鲜战争，中国介入朝鲜问题，然后到日内瓦会议，再到 1956 年八月事件，中朝矛盾激化，又突然扭转。1958 年志愿军撤军，中朝关系又突然转好。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中朝关系又下降。1962 年，中国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划给朝鲜，中朝关系又特别好。1965 年中朝关系又下降，因为 1965 年苏联领导人变了，所以苏联对朝鲜政策发生了变化，朝鲜又脚踏两只船。文化大革命，中朝关系降到谷底。1969 年，中

苏珍宝岛冲突发生以后，中国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政策，中朝关系又突然好起来了。中朝关系就这样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有一点，就是从 1957 年以后，毛泽东对朝鲜的政策就没有变过，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政策没变。因为有些事情也在他的掌握之外，比如文化大革命，其实毛失控了，外交就失控了。

那么为什么中朝关系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因为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交好超过十几年的很少。跟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越南、东欧国家，哪有好的？越南算是最不错了，但是 1975 年也不好了。我刚从越南回来，中国人在越南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我就不讲了，你去走一圈就都知道了。但是中国和朝鲜的同盟关系，一直维持到 80 年代。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同盟的基础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都不一样。共性的地方有几个，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构成同盟的基础。在冷战时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存在这些。但是跟朝鲜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领导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非常特别，就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关系，包括周恩来和金日成关系，绝非一般。第二，就是地缘政治，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这两点是很具有特殊性的，但是就是这两点，在邓小平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先说一般性的，比如意识形态的分歧，从中国搞改革开放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中国搞市场经济，朝鲜是特别反对的。1990 年，金日成来中国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虽然经过六四这个事，但邓小平又往回扳。邓小平劝金日成说：“你应该到深圳去看看，到山东的青岛、烟台去看看，看看我们沿海城市是怎么搞改革开放的，经济又是

怎么发展的”。金日成没有去，不但没有去，回国以后还跟几个外国领导人说：“我绝不会像中国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方针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从毛泽东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了。1974年到197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联合国了，进入联合国以后，我们和很多周边国家开始建交，比如泰国，马来西亚、缅甸，但是建交以后就出现了个问题。原来我们支持人家的反政府武装，共产党要推翻这个政府，中联部的职，我们给钱、给武器，支持共产党推翻政府。但是1971年以后，我们进入联合国，跟那些国家建交了，外交部的责任是跟人家搞好国家关系，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提出一个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的关系。但是到邓小平时代，这就彻底改变了。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1983年到1985年，我们分别跟菲律宾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谈话，大概意思就是劝他们别折腾了。陈平（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到北京，邓小平说：“我最后给你四百万，做点生意算了，我们也管不了你们了。”后来他们差不多都跟政府讲和了，就是下山了。中国放弃了世界革命和革命输出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谁接过来了？金日成。刚才我还和别人聊到前几个月下台的穆加贝，穆加贝是40年前革命成功的，那不是中国支持的，那是金日成支持的。所以穆加贝1975年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个访问的是平壤，回国顺道访问北京。那个时候，金日成就已经有心要替代中国来指导世界革命。所以到了80年代的时候，主要的训练外国共产党的功能都是由朝鲜接替的，而且重点就在非洲。

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包括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些考

虑，已经发生了很重大的分歧。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跟苏联、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不大容易理解的是领袖之间的这种个人关系，完全改变了。因为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方针就是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主权，我给你，你要自由，我给你。你要钱，要人，要地，都没有问题，就一点，你跟着我走就行。这是典型的天朝观念。

历史上中央王朝处理周边问题就是这样，给你点地，无所谓。雍正六年，处理了和越南的 120 里的一块地。当时安南王（就是越南）说这块地是他的，云贵总督说是我们云南的。两个人吵到朝廷上，雍正大笔一挥，说 80 里给安南王，40 里给云贵总督，就这样。后来云贵总督上一折子，说：“我没有问题，中央给我多少地我就管多少地，但是听说安南王不满意，他非要把我这 40 里也要过去。”雍正就不高兴了，又拟旨，大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的，说：“土地都是朕的，朕愿意给谁就给谁。给安南王就是外藩，给云贵总督就是内地，如此而已。区区 40 里，你们还争什么？”刚写完，安南王也递折子上来了，说：“我不是不满意，反而是对陛下感激涕零。陛下信任我，给我 80 里，我一定世代代替中央守好这块地。”雍正一看，龙颜大悦，又一批：“干脆那 40 里也给你吧，替朕永守之。”这就是典型的天朝观念，给你点地不算什么，因为你都是我的。

毛泽东给金日成天池和长白山，很多人不理解，但其实在毛泽东观念当中，并没有现代国家的边界、主权这些观念，所以无所谓。先不说朝鲜，1960 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毛泽东把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叫到北京，跟他说：“喜马拉雅山那块地，人都上不去，这块地不重要。但是尼赫鲁要，我就是不给他，因为他是反革命。你们要是夺取了政

权，喜马拉雅山以南，都拿去。”谁有这个气魄？所以毛泽东的观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以这种观念处理和金日成的关系，就非常特殊。

再比如志愿军撤军。1956年底的时候，我们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主要驻扎在平壤和三八线之间。当时整个朝鲜局势完全是中国说了算的，在日内瓦会议上，中朝代表团作主的也是中国。毛泽东为什么要撤退军队？就是要给金日成充分的自由。1956年的时候中朝关系非常紧张，毛泽东要把金日成拿下，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苏联的问题，包括金日成自己的善变），他没有这么做。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和金日成见面的时候说：“老金，你还是很革命的嘛，我这个人有时候偏听偏信，看错你了。你不错，你要是不放心，我就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这是原话。其实毛泽东知道，金日成是非常不放心的，因为有40万志愿军在朝鲜驻守，他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毛泽东把志愿军全撤回来。金日成最感动的就是这一点。毛泽东有三件事对金日成影响很大。第一件事就是1957年的撤军，金日成非常感动，所以1958年中朝关系一下子到达顶峰，特别要好。第二件事就是给了金日成一块地，就是长白山天池。第三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要把东北交给金日成管理。

2000年的时候，金正日来见了江泽民，说：“江总书记，我准备到东北视察一下。”江泽民有点纳闷：“你怎么叫视察呢？视察在中文的意思是上级到下级检查工作，你那是访问。”“不，视察，我爸跟我说的，东北都是我们的。”江泽民一听，更疑惑了：“东北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其实这话也不是我爸爸说的，是毛主席跟我爸爸说的。”江泽民回来就找中联部部长，一经调查，毛泽东确实说过。我写那本

书的时候，我调查了一下，从1958年一直到1964年，毛泽东至少讲过五次。但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了两层意思。

一个是讲边界问题，他说：“你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辽河，我们的祖宗说，中朝边界在鸭绿江。你看现在都把你们赶到鸭绿江南边去了，怪可怜的，但是这不是我的错，是封建主义欺负了你们，这些都是武则天、唐太宗、隋炀帝他们干的，我不是把天池给你们了吗？”周恩来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就是我们的祖宗欺负了你们的祖宗，现在我要替他们向你们道歉。但是这层意思，我理解更多的是对党内做说服工作。因为中朝边界条约，到现在是唯一没有公布的一个边界条约。中国对外签的所有边界条约都公布了，只有中朝条约，到现在没有公布。具体原因我现在也不大清楚，当时双方怎么商定的，也看不到档案文献。但是从周恩来回国以后在辽宁省和吉林省的谈话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领导人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按照周恩来原来的方针，凡是签了国际条约的，寸土不让。中朝过去是有国际条约的，比如《间岛条约》，按条约长白山的主峰和天池都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因为金日成强行要求，就给他了。这是一层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层意思主要是对党内讲的。

他跟金日成讲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说：“东北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将来打起仗来，金首相，这个地方我就交给你管了。你们是前面，我们是后方，将来你前方后方一块管吧。”金日成特别激动：“主席，真的？我就到东北视察视察。”1963年还真来了，后来毛主席让邓小平到东北陪他。他在整个东三省走了一圈，接见了所有司长以上的干部，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回去以后，

还在朝鲜办了一个东三省领导干部培训班，到文革前办了两届。我看了他们给中组部写的报告，记录了金日成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汇报工作。

所以从毛泽东的观念来说，他是把整个亚洲都看成是我管的。像他给马来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包括给越南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武器虽然不如苏联，但是我们不要钱，我们白给啊。国际主义，你要钱还算什么国际主义？”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有特别理想的一面。因为1949年斯大林就讲了，说以后亚洲革命就归你们管了，所以毛泽东认为他要把亚洲革命的领导人责任负起来，不出点钱，不让点利，能管的起来吗？

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观念就完全没有了，因为邓小平根本就不是那种人。最大的差别看1978年，华国锋作为国家主席去朝鲜之前，中央开了一个会，邓小平跟华国锋讲：“你到朝鲜去，两件事不能谈。第一个就是东北问题，因为朝鲜人老惦记这个事，即使朝鲜人提出来，你也不能回应。第二个就是金正日接班的问题，金正日要接班，他们必定会征求中国的意见，你不能答复。”后来到1984年1985年，在金正日接班的事上，中国退了一步，因为那时候和苏联闹的矛盾比较深，要维持和朝鲜的关系。但是东北的问题，一直再没有答复。我问了中联部，中联部说朝鲜每次来访问都提这个事，什么时候安排他们视察东北啊，哪个省怎么交接等等，他们确实当真了。所以这个事到邓小平的时代，就不容他再提了。因为领导人的这种理念的变化，过去维系中朝关系的深厚基础就瓦解了，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因为过去我们传统的

看法，是外国列强进攻中国（比如美国要进攻中国）要从北边走，就是经过朝鲜半岛，所以美国以韩国为跳板，攻打了北朝鲜才打中国。所以在中美对抗的情况下，在冷战格局的背景下，朝鲜的确是中国的挡箭牌，或者说前沿阵地，朝鲜是前方，我们中国是后方。在这种格局下，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朝鲜要钱、要粮，都不能不给。1960年，中国人自己都吃不上饭，金日成开口，30万吨粮食马上拨过去，所以那个时候是朝鲜要什么中国给什么。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我们和朝鲜的经济往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因为他替我们守大门呢。”这就是地缘关系的作用。

但是到了80年代，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在毛泽东晚年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就是中美关系缓和。现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档案，关于中美会谈、中日会谈里面涉及到的很多朝鲜问题、中美问题，都解密了。它反映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已经趋向一致。这是基辛格、周恩来、毛泽东、尼克松的共识。所以那时候，中国就已经不再坚持说美军必须撤出南朝鲜。

在与基辛格会谈前夕，周恩来很认真地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列了八条，其中一条就是美军必须撤出朝鲜半岛。但是从他跟基辛格的会谈记录中看到，他刚提这个事，基辛格说：“我们走，没有问题。但我们要真走了，朝鲜半岛可就是一个真空，日本人要进来，怎么办？”周恩来一听，才想到还有这个事啊。回来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材料我们看不到，但是第二次会谈，他语调就变了，说：“你们不但要走，你们首先还要保证，你们走了，日本人不能来。”因为从历史上看，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真正担心的是日本人的军

国主义。

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问题说的非常明确。具体在哪年我记不清了，不是 89 年，就是 90 年，邓小平说美军的存在是朝鲜半岛稳定的因素之一。另外，在朝鲜的统一问题上，中国政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中国是毫无疑问地完全支持金日成统一，到 1984 年之前，邓小平也是这个观点，就是中国支持金日成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统一方案。原因很简单，因为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要被统一的。当然，统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为原来中国是和金日成一样主张武力统一，和平谈判是一个幌子，只要有会，打一场胜仗就结束。但是 1970 年中美会谈以后，中国的方针变了，必须和平统一，不能再使用武力。

1975 年越南统一了，柬埔寨红色高棉也取得了胜利，赢得了政权。金日成认为自己比他们革命都早，人家都成功了，他这 40 年还没有统一，所以他非常着急，他在党内讲，想出一个方案。因为当时韩国民主运动比较高涨，所以他想要利用这个形势，煽动南朝鲜人民起来游行、闹事，如果伪政权敢镇压，或者美国敢干涉，北朝鲜就全线出动，实现武力统一。

但是这个方案，首先得要中国同意才行，所以他紧急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来谈什么，但是不见又不行。最后毛泽东确实见了金日成，而且搞的非常隆重，特别张扬，但是就是不谈正事。见面以后，金日成把所有代表都轰出去了，就他和国防部长吴镇宇两个人和毛泽东谈，毛泽东就叫上了邓小平，四个人在那里谈。毛泽东上来就说：“我现在眼睛不好，也看不见了，耳朵不好，也，也听不见了。就谈张三身体怎么样，李四病好了没有啊？”就这样东

拉西扯，金日成着急，憋了一肚子话。结果毛主席后来好不容易问了一句，说：“金首相最近忙什么呢？”“最近我们可忙了，南方革命形势大好啊……”刚说到这里，毛泽东就打断了：“什么什么，耳朵不好，听不见。今天我们也不谈政治了，散了吧。”谈话不到半个小时，所以金日成非常憋屈。后来，毛泽东指了一下邓小平，说：“你有什么事，跟他谈吧，这个人很厉害。”金日成和邓小平谈了四次，谈的内容不知道，这个档案我们还没有解密，但是结果非常清楚，因为最后发表联合公报里什么也没有。不像他刚来的时候，金日成在人大大会堂的讲话，非常嚣张地说：“一旦战争起来，我们失去的就是一条临时分界线，得到的是整个朝鲜。”临走的时候，就得到一句中朝友谊还要长久，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走了。所以从那以后，包括邓小平执政的前七八年，中国就再也没有支持过朝鲜采取武力的形式。

到 1990 年的时候，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同意两个朝鲜的政策。原先我们一直跟朝鲜非常一致的，因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谁也不能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说法是分裂我国的阴谋，谁敢接见台湾的外交官，中国就跟他断交。金日成学中国，不能两个朝鲜，必须一个朝鲜，那时候中朝完全一致。1990 年突然变了，中央内部是怎么讨论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这段时间的档案，很多都没有解密。但是《李鹏外事日记》中提到，李鹏去找金日成谈，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了，中国要承认韩国了。金日成非常不高兴，说：“你们能再推迟一年行不行？”其实韩国人非常聪明，搞北方政策，再加上 80 年代东欧剧变，从匈牙利开始，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陆续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为了照顾朝鲜的面子，照顾中朝关系，一直回

避着这件事。但是实在回避不了了，因为每年都在讨论不让韩国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原来中国和朝鲜是一致的，认为要统一了以后才能进联合国。金日成当时也提出来，要建立高丽民主共和国，搞一国两制。

一开始邓小平很支持，说一国两制不但可以解决国内问题，还可以解决国际问题。没到两年，中国的政策就变了，这个变化导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后果，就是中韩关系拉近。中韩关系拉近，整个地缘政治就发生了变化，韩国不再是中国的敌人了，反而是中国的朋友。其实中韩关系，一会儿可能千先生讲的更细致，因为他是1984年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商人。中国对韩国一直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其实韩国人是非常敏感的。现在韩国档案都解密了。1970年，中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韩国人就在讨论说：“既然咱们老大都能跟中国来往，咱们怎么不行啊？”于是就想方设法给中国传递信号，但中国一直非常冷漠，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根本不搭理。

到邓小平的时候，才开始逐步放宽，开始可以做私人买卖。到了1980年，韩国运动员可以来中国了。因为中国搞国际比赛（比如亚运会、奥运会），是有规定的，凡是会员国的运动员都得让人家进来。中国曾经两次不让韩国运动员到中国，被取消了组织比赛的资格，一次篮球，一次羽毛球。所以中国政治局讨论，说我们不能总是为一个朝鲜影响我国长远利益。因为以往中国每次跟韩国有一点来往，朝鲜立刻变脸，一变脸，外交部就马上跟中央说，这个事不能干，那个事不能干。长此以往，整个中国的长远利益就受到了影响，所以1980年开始改变了。

慢慢地，这种民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受影响

最大的是两个领域，一个是体育，一个是经济。体育方面主要体现在办亚运会，张百发去的那次就是千先生他们接待的，招待得特别周全，带着张百发逛商场，让他开了眼界，感受到韩国的美好。还有就是帮助中国举办 90 年亚运会，韩国立了汗马功劳。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组织这种大型国际比赛的经验，压根不知道要怎么弄，整个方案都是从韩国移植过来的。所以在体育方面的接触上，中国尝到甜头了。再就是经济发展，中韩贸易呈现跳跃式增长。1986 年的时候，中韩贸易和中朝贸易还差不多，到 1988 年，中韩贸易就翻几番了。中国跟朝鲜的经济关系，就一步一步衰落了。

衰落的原因是朝鲜本身经济不景气。朝鲜人做生意没有信用，不光骗中国，骗的最多的是苏联。苏联 50 年代就跟中国人讲，说和朝鲜人做生意要小心，他们不守信用。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易货贸易，比如说今年我给你 10 吨钢，你给我 100 吨苹果。这 10 吨钢运去了，又说今年苹果欠收，没有办法，改明年吧。明年改 200 吨，结果又欠收，你改贷款吧。最后易货贸易变成贷款，贷款五年还不上，您干脆无偿援助算了。苏联老吃这个亏，后来跟中国讲，但中国那时候毛主席总是说跟朝鲜不要算经济账。

但是到邓小平时代，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当然算经济账。所以到 1984 年底，邓小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对杨尚昆、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几个人说：“我看对朝鲜的政策要变一变了，不能他们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刚说完，朝鲜送一批飞机来了，这批飞机是当年毛主席白送给人家的。过了几年了需要大修，说送回来让中国大修一下。飞机送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负责人说：“修，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给钱，你不给钱，我们怎么修？”朝鲜人说：“飞机都是

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咱们还是兄弟吗？”“我们工厂已经承包了，你不给钱，总得有人给钱。”结果打报告到经贸部、外交部，谁也决定不了这个钱从哪里出。最后找到邓小平，邓小平拿过来文件批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

所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导致了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急剧下降，而跟韩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高涨。从间接贸易发展到1989年年初的直接贸易，然后就提出来要建立贸易代表处。因为贸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的话，就会很受限制。本来间接贸易就存在很多问题，总需要转口香港、日本，增加成本，韩国人要入境也很困难。那时候我在深圳也跟他们做过生意，深圳来不了，两个人到香港去谈，非常麻烦。所以经济往来推动了中韩政治关系的发展。1989年，还没有发生六四的时候，中韩关系已经突飞猛进了，我认为1989年是中韩关系大跃进的一年。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中韩建交，还是后来决定的。但是很明显的是，1989年的事件反而推动了中韩的建交。我们看时间表能看出来。1990年，中国先承认了两个朝鲜，因为中国在联合国是有否决权的，中国只要不否决，韩国就进入联合国。那年李鹏和金日成讲，我们不能再投否决票了，要不然中国在世界上的威信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年也不能等了。

这一步走出去以后，就扫清了中韩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障碍，同是联合国成员国，建交就理所当然了。1990年，第一位韩国官员正式访问中国，而千先生那时候是作为商人、作为民间代表到的中国。再加上中韩贸易代表处的建立，因为中韩贸易代表处实际上背后是外交部，都是外交机

构。韩国来的总代表我见过，他就是外交部东亚科的。到1991年的时候，中韩建交的基础就全都具备了，所以1992年，中韩就建交了。这时就不再是跟朝鲜商量，而是去通知他。杨尚昆先去打了个招呼，说我们准备要跟韩国谈判。两个月以后钱其琛去，说我们已经决定跟韩国建交。金日成无话可说，就最后说了句：“我们尊重中国的选择，你们愿意走什么路是你们的事，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六四事件以后中韩建交的速度就突然加快了？我在那篇文章里提了点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很不成熟，主要是因为没有档案依据，就是我不知道中央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能看的出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韩速度极快地建交了。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中央是不是没有考虑到中韩建交可能对中朝关系带来的这种危险后果？现在也下不了结论，因为这些材料都没解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1985年12月12日，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1月30日，朝鲜签订全面保障监督协定，4月协定生效。1992年8月宣布中韩建交，然后1993年3月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继续核实验。所以中朝关系和中韩关系的这种剧变导致了朝鲜政策的转变，至少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这样。

当然现在外交部讲的这些话，我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其实都是美国刺激的。到2000年以后有没有美国的刺激，这我就没研究了。但是起点一定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关系的变化导致了朝鲜政策的改变，大家可以考虑下是不是这样？

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沈教授，他对朝核问题的根源做了一个铺垫，从历史角度讲。下面我们就欢迎北大的沈定昌教授，跟我们讲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热烈欢迎。

沈定昌（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来到故乡上海和大家在一起交流。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上个月我们在韩国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乔依德先生，他说我们这有个沙龙，希望能来跟大家交流一下。他让我讲讲关于朝核僵局的由来和破局这个话题。我也梳理了一下，因为这个朝核问题确实由来已久，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1958 年，美国就开始在韩国及其临近地区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据初步统计，大约布置了 2600 多件核武器。美国冷战期间在南朝鲜布置核武器这一事件是朝鲜核问题的起因。

朝鲜就借助苏联的力量，通过苏联的技术支持来搞核研究，当然最初是打着和平利用开发核能的口号来研究核武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朝鲜在 1965 年拥有了自己第一个 2 兆瓦的小型氢水反应堆。到了 1987 年的时候，朝鲜就建成了 5 兆瓦的实物反应堆，这种反应堆的核废料，就可以继续作为提取核武器的原料。在 1988 年的时候，美国就判断朝鲜已经具备了制造两到三枚原子弹这种能力。美国从 70 年代就开始关注朝鲜核研究的动向。到了 90 年代，美苏之间进行交涉，大约是 1991 年 9 月份的时候，美国在各种压力下宣布废除部署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战术核武器。美国也把部署在韩国的那些核武器给撤走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两国总理互访，并达成了很多协议，双方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到了 1992 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怀疑朝鲜还是在搞核武器的实验，要求

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从1993年2月开始，朝鲜大概一共接受了6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定期检查。那时候的检查也没发现太多的问题，但是美国提出还要继续进行特别的检查，朝鲜就不同意，于是就形成了僵持，就爆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自从第一次爆发朝核危机以后，经过了三方、四方乃至六方的多次会谈，结果朝鲜的核武器在反反复复的会谈下逐渐发展了起来。

综合这些情况，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大概有这么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应该说是冷战对抗的延续。因为大家知道朝鲜半岛一直是处于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3年虽然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是这个停战协议不是终战协议，也不是和平协议。在这种冷战的背景下，朝鲜觉得要发展核武器来自保，来自外部的威胁是他开发核武的动因之一。第二，朝鲜有自身的安全诉求。停战协议签署以后，韩国和美国结成了同盟，美国在韩国驻军，而且美韩几乎是定期地搞联合军演，所以朝鲜觉得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和韩国建交。过去的盟友都和韩国建交了，站到韩国这一边去了，他觉得没有一种所谓的来自老大哥的保护。中朝还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现在中国也和韩国建交了，他没有安全感了。第三，是他的国内政策的一种需要。刚才沈志华老师也讲到了朝鲜这么一个状况，他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面对外部那么大的压力，搞了一个核研究，也是对国内的一种交代。朝鲜坚持搞核武器大概是出于这么三方面的原因。

朝鲜核问题从第一次危机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进行了多方的斡旋，六方也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是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而且出现这种僵局，我

考虑大概也是有这么些原因。第一，就是美国的对朝政策。美国表面是要求朝鲜弃核，其实是要把朝鲜弄垮，所以老是搅合在一起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单纯从解决核问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有时候就容易把事情搞砸了。包括我们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有时候就不能够很好地履行。第二，朝美之间严重缺乏互信，不严格遵守协议，不履行承诺。前几年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后来由于朝鲜的问题，或者是美国方面的，这样互相一扯皮，把这个事情又弄僵了。第三，中美两国就如何解决朝核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日韩等国一直主张通过军事恐吓和严厉制裁来拖垮、压跨朝鲜。而中国一直是主张通过和平对话、适度的制裁来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朝鲜核问题，一些主要国家各自的解决方法存在分歧。第四，南北关系对朝核问题的影响。朝核问题存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其中南北关系的变化对朝核问题的影响是很大的。当南北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比如金大中、卢武铉执政时期，那时候搞阳光政策，南北关系就比较好，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推动能够顺利一些。但是一旦南北关系崩了，这个核问题又马上出现。第五，国家领导人换届对朝核问题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克林顿后期对朝核的态度，和他后来的继任小布什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克林顿时期，朝美关系也有改善的迹象，甚至说美国正在考虑安排克林顿去访问朝鲜。但是好景不长，克林顿下台以后，小布什一上台就马上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韩国也是，领导人一换，南北关系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金大中、卢武铉时期，南北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比如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和南北铁路的连通等等。但是李明博上台以后，对朝政策就是 180 度的大转弯，一下对这个解决问题带来很大的影响。刚才说

朝核问题出现僵局，大概就是这么一些原因。

最后，我谈一下对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想法，供大家参考。第一，我觉得解决朝核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该综合考虑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是互相分不开的，以核谈核，不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所以一旦弄不好，马上又要谈崩。

第二，仅仅通过制裁不可能彻底地解决朝核问题。事实也证明，对朝鲜的轮番制裁，一轮比一轮厉害，但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初略统计了一下，从朝核问题到现在，联合国的相关制裁决议大概将近 10 个。去年一下通过了 3 个决议，一个不行再来一个再加一个，但是制裁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值得探讨。另外，这个制裁的有效性还和中国的态度有关。最后能使朝鲜伤筋动骨的，可能还是中国。美国制裁他，实际上动不了他的筋骨，中国的石油和贸易和朝鲜彻底一断，才会真正伤到朝鲜，但是中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来制裁，制裁不解决问题，要通过多方对话来解决。当然美国的制裁是一箭多雕的，一个通过制裁来压跨朝鲜，第二个是离间中朝关系，第三个就是将朝核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嫁祸于中国。

关于制裁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态度，其实也是在发生一些变化。最初的时候说制裁没用，不主张制裁。后来提出制裁是两把钥匙之一，就是说也可以通过制裁，也可以通过对话。中国对制裁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和后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觉得是做得很被动的。朴瑾惠为什么会发生坐山车式的态度转变？大家知道朴瑾惠顶着美国很大的压力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参加亚投行，尽管是在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参加之后。不管怎么着，她是站

到中国这一边。另一个，就是 2015 年的“9•3 阅兵”，西方国家没有来参加我们这个反法西斯大阅兵，但是她来了。当时韩国人还觉得挺荣耀，你看我们的朴总统紧挨着习主席。朴瑾惠回去不久，很快这个态度就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其实这个萨德美国早就想在韩国部署了，韩国的前几任总统都给拖下来了，都给敷衍过去了，推掉了，那么朴瑾惠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去同意了呢？我想这里头和中国对朝鲜的态度还是直接有关的。其实朴瑾惠上台以后也是急于想统一，搞了一个统一准备委员会，对朝政策也比较积极。那么中国呢？开始也是表示支持她。到最后要动真格了，关于制裁朝鲜，中国不可能做的那么绝。韩国非常希望中国给他断油，那中国肯定是做不到。这样的话，朴瑾惠觉得这个落差很大。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使得朴瑾惠的态度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解决朝鲜核问题，还得和朝鲜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就朝核来谈论朝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中国的态度。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对朝鲜的战略定位，朝鲜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战略资产，还是我们的战略负担？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应该有个明确的定位，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步就好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解决朝鲜问题的路径。我想还是中国政府现在也是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有步骤地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提出了双暂停，包括双轨并行这么一个政策。当然双暂停可以逐步地来推动这个事，但其实这个双暂停并不是中国先提出来的，而是朝鲜先提的。朝鲜在 2015 年韩美要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说你们如果能暂停军事演习，我可以暂停核实验。但是韩国、美国都

没搭理他。2016年韩美军演的时候，朝鲜又提了这个问题，美国还是没搭理他。后来我们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事，包括俄罗斯也同意我们的这个想法。但是对这个双暂停，韩国并不赞成。是否还有一种误解？因为我也搞语言，韩国把它翻成“双中断”，中断和暂停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双暂停以后，韩国报纸上好多都是双中断。后来有一次我好像听到中国报道，说韩国、美国、朝鲜都同意这个双暂停了，怎么叫同意双暂停呢？现在金正恩答应要去参加平昌冬奥会，韩国也提出奥运会期间不搞军事演习，美国最后也同意了。那么这个事和双暂停能搭上边吗？当然是暂停了，但是我觉得韩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奥运会，因为奥运会在你这个举办国举行的时候，你周边不要去动枪动炮的，不要搞得形势那么紧张，这是违背奥运精神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也顾及这个问题，所以提出这个往后推，并不是说暂停了，就是说先往后推，奥运会开完以后再说，那么至于开完以后搞不搞就不好说了。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核问题呢？我想是不是可以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营造朝鲜半岛的和平氛围。首先要改善南北关系，南北本身这么对峙，这种紧张气氛不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然后还要改善朝美关系，其实朝鲜一直较着劲，他就是要跟美国改善关系。80年代后期，是南三角、北三角冷战时期，后来这个三角破了，破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和俄罗斯都和韩国建交了，剩下就朝鲜一个，他就想是不是你这头建交，换来的应该是我和美国建交，我和日本建交。但是美国不搭理他，日本倒是希望和朝鲜建交的，朝鲜主要是较着劲，要跟美国先改善关系。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话，朝美关系改善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前提下朝鲜停止核试

验，当然这个过程应该是漫长的。第二步就是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停战协定废除，改为和平协定，最后达到朝鲜弃核，半岛无核化。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解决过程中，作为中国来讲，我想还是应该要分别加强与朝鲜和韩国的合作与交流，来促进半岛和平统一。

我想中国是支持半岛统一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在其他会上也讲过，有的人就反问我：沈老师，你这个是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其实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包括中国也好，都是希望分而治之。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觉得统一对中国更有利。就比方说一个邻居，你这个邻居的两兄弟老在这个地方给你闹，你中国能安宁吗？那这个统一我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统一？如果是美国主导的统一，当然对中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是中国有话语权的统一，那应该对我们的发展有利，符合我们国家的周边外交战略。

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合作。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因为朝鲜问题也好，朝核问题也好，归根到底主要矛盾是朝美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和美国加强合作与沟通。当然美国有自己的战略目的和企图，想通过朝鲜问题扼制中国，进而能进一步控制亚洲、控制全球，做老大。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在崛起。如何来处理好这个关系？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中国千万不要让美国得逞，刚才我讲到美国在离间中朝关系，其实现在朝核问题弄到现在，美国是赢家。你别看他现在说，害怕朝鲜核武器能打到美国去了，能打到吗？美国也明白打不到那去，美国通过朝核问题适度地把朝鲜半岛炒成紧张状态，把这个萨德也弄起来了。朝鲜也是赢家，从开始初步搞，到宣布已经完成了核武器，不管他完成不完成，其实基本上已经达到

这个目的。输家是谁啊？中国，中国现在弄得里外不是人。最近中国多次参与制裁，朝鲜前一阵在报上就公开骂中国，说你们忘本了，当年你中国在搞原子弹搞实验的时候，世界各国也是对你制裁，唯独我朝鲜是支持你的，现在你反过来要制裁我。那么和韩国的关系呢？因为萨德问题，又弄得很僵，文在寅来了以后，这个问题有一个转折点，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我想这个还得靠两国领导人的智慧。

总之，我觉得这个朝核问题确实一直非常复杂，一直拖下来。如果不从根子上把朝鲜问题解决好，这个朝核问题是得不到真正解决的。好，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沈教授。沈志华教授讲的是我们国家对朝政策的一些变化与中朝关系的演变。沈定昌教授则是从比较全面的角度，从美国、朝鲜、韩国等几个方面，把那个关系理了一理，也提出了自己对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看法，主要是觉得朝核问题不是单纯的核问题，要把整个朝鲜问题结合起来。最后我们非常欢迎千辰焕先生给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千辰焕（韩国金九财团副理事长）：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让学生们提前学习每天的部分。所以第一天上来，那个老师表情严肃，老师说今天有很多人准备好了吗？没有一个举手，所以他说下星期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一半学生举手，另一半学生还是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老师说，还有一半的学生没有准备好，那就下学了。第三次来的时候，大家都举手，全部准备好了，所以他满脸高兴，他说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下课吧。今天两位教授已经给我们作了那么好的演讲，我也学到了不少，所以我也下课。（众人笑）

我本来准备的内容就是“朝核问题的教训”。实际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就完全是四面楚歌。我是1984年从南朝鲜来的，我从东京到上海，换车去北京。我到北京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当天还下着雨，没有人接我。我以为那边能很容易找到出租车，但是到了那边发现不然，结果一位日本先生跟我两个人留下来，我们冻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一部车来。我说，司机先生带我们去那个长城饭店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了长城饭店。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的经历。第二天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差不多有九十多个西方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两个香港那边来的，我是唯一一个从南朝鲜来的。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进入中国，到现在为止算起来差不多有500次了。20多年里头，为了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在这边的时候，在中国投资了15个亿，搞了32个工厂，职工大概有1.8万到2万左右。我们真的非常努力，把两个国家的关系弄好，结果也是挺好的。但突然就去年开始，就是那个萨德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几十年下来跟中国做生意，因为一个政治上小问题的发生，就不得了，政治导致的问题很难解决。北朝鲜的核问题，到底这怎么弄？我们给他们很多钱了，我们不太懂他们的意图。

中国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两个不要吵架，就按照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弄了半天，还是没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北朝鲜方面已经拥有了很好的核武器，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对他也并没有一点办法，互相之间也会越来越麻烦。所以朝核给中国方面也带来了问题，给美国方面也带来了问题。我希望美国能够处理好北朝鲜的核问题，

但是他们处理的不是特别好。除了全面战争这方面美国是有一点贡献，其他局部的很多问题，美国是一点都没有帮忙，尤其是核的问题。现在就是给朝鲜制裁，就是对立，美国方面现在就是威胁他们。

刚刚沈丁昌教授提出了很多问题，还提出了怎么样解决的办法。沈丁昌、沈志华两位教授，还有其他先生到韩国来，跟我们开了一个会议，也谈及了朝鲜核问题。正如我刚才说的，中国也是面临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美国也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日本也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坦白告诉你们，韩国人一般老百姓，大家都认为中国还是会听我们的话的，我们一直这样相信，直到这次发生萨德事件。

朴槿惠来中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胜利 70 周年。我们韩国男的不行，打高尔夫球也好，女的是很了不起的。尽管美国政府极力反对朴槿惠参加 70 周年的那个纪念日，但朴槿惠还是来了，中国方面还是很赞扬她。男的不会来，文也好，他们是不会来的，他们想的东西太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上次沈志华教授在韩国说过的，两个国家或者三四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美国合作的话，我觉得很可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尤其是背后问题，或者是北朝鲜的问题，或者是北朝鲜和南朝鲜的问题。对东北亚的政治方面，也有很好的一个情况。以后半岛统一起来，这个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就面临怎么样把中国东北和朝鲜这一块经济发展起来，并且和韩国有一个经济上的合作。

我这边百分之百同意你们的这想法，我今天在这里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用，两位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演讲。我就非常

感谢各位来宾关注这个问题、担心这个问题，而且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各位。

乔依德：非常感谢千先生。千先生从一个对我们国家非常了解，而且有友好感情的一个韩国人的角度，谈了自己各个方面的感受，我想在坐各位能体会到他的一些想法。今天的时间不早了，我们可以允许提一到两个问题，抓紧时间，尽量简短一点。

赵广彬：我的提问尽量简单点，因为我是做金融服务企业的，不管是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我都很关注。第一个问题，朝核对中国是否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国已经成了很大的受害国，就是朝核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二个问题，未来有没有有可能爆发冲突？

乔依德：我们还是一起来回答吧。沈教授，你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有两个问题，一个说中国是不是受害国？另一个是否会爆发冲突，或者讲的明确一点，爆发战争的概率有多大？

沈志华：第二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战争的爆发有很多条件，这个得了解很多具体情况和信息，你才能说明这场战争爆发的哪些条件具备，哪些条件不具备。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的，但是我从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有几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中朝根本的利益早就分离了，他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不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这应该是中国决策的一个基础，一个基本认识，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你的决策肯定是有方向问题的。

我的第二个判断，就是阳光政策也好，南北和谈也罢，或者朝鲜半岛的缓和，这不是第一次了。从 70 年代开始将近 40 年时间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朝鲜有困难的时候马

上就南北和谈，和谈就给他争取时间。你不信咱们就继续往下看，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发展的。和谈了 40 年，把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状况，现在变到了一个有这么精准的高超技术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哪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争取了很多的时间，就是你们大国之间肯定有分歧，他只要释放出一个和平的信号，你们就开始吵，你们就闹，都想跟我谈吧？谈吧，我有困难时候马上跟你谈，等我困难过去了马上就发展，关系紧张了我再停下来，循环反复 40 年了，才到了今天难以收拾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教训，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深刻记起来的。

第三个判断是什么呢？我认为早晚有一天朝鲜会出卖中国。我不光研究中朝关系，我研究中苏关系、中印关系、中缅关系，包括越南问题。我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弊病，就是他从来不把对方当一个平等的现代国家来理解。咱俩就是兄弟，兄弟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你想想啊，苏联跟南斯拉夫，苏联跟阿尔巴尼亚，苏联跟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跟苏联、中国跟越南、中国跟朝鲜，这关系都是怎么变的啊？最后都是兄弟打你。我们为什么打苏联？你想苏联人怎么想？50 年代给了你那么多钱，给了你那么多技术，说翻脸就翻脸，说打就打。中国跟越南也是，我们现在不说是非，说的不是该不该打，我们就说这个现象，兄弟翻脸很容易。跟这个相关联的就是，朝鲜为什么一个劲找美国？因为你中国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中国觉得苏联靠不住了就找美国，美国一帮手，联手干苏联。但是我觉得朝鲜找美国可能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你太小了，美国不值当为你和中国翻脸，因为美国人最看重什么？是意识形态。但是当时美国为什么会容忍中国这么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了吗？归根结底是因为利益太重大了，朝鲜是不值得的。美国档案和韩国档案都有记录，1971年开始，金日成就托周恩来要跟美国拉拉关系，他只要跟美国拉起关系，一脚就把中国踹了，你不信，咱们就等着看，这就是历史。所以你说具体我们也不能给中央出什么主意是吧？但是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可以告诉你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能不能避免继续发生类似的事？我很同意沈教授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朝鲜方面一再被动，我们必须好好吸取一下教训。

不说了，越说越激动。

赵广彬：我简单说，从外交角度讲，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至于朝鲜半岛能不能打，取决于几个因素，这里头主要的是美国因素。因为就现在的中美关系来讲，我想他们本意不想打，起码是他不愿意。这个半岛老有点事，你去闹吧，就是说我让你半岛总有点事，但是不要闹的太大，这是他的一个安排。但是什么时候动武啊？一旦朝鲜把核武器发展到真正威胁他了，那他肯定真想打，这是从美国的角度。但是美国一方想打，不见得能打起来，为什么呢？中国不愿意，中国一再表态不要在我们旁边打，这是中国的态度。韩国也不想打，韩国一打全打乱了。韩国甚至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个半岛就是我的，他的宪法就是那样，你要打等于就是打我们。所以我想在一般情况下打不起来，每次看起来好像快要真的打了，但最后打不起来。刚才我讲了，开战的前提就是美国确实觉得威胁他了，那么他搞个事，有个爆观点。

乔依德：千先生，你说一下吧，他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沈志华：你们是不想打？

千先生：韩国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南北韩距离太近，我们互相不信赖。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南韩有一边是比较保守的，另外一边是比较左派的。我们经常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假如亲美的话，儿子们全部反美。所以现在我们的年轻一辈，他们最不愿意打仗。但是我们这样老的人，打仗几天没有关系，不会长期打仗的，打仗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来吧，来一次然后马上解决，就是这种想法。这个事很难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想法已经分裂了。在这种意见分歧之下，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那问我要不要打？我也是不想要打。因为我们的朋友们感觉好像什么时候都会发生战争的样子，但是他们来了韩国以后，看到那个老百姓的表情，一脸的悠然，没有什么问题的样子，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每一次发生冲突后都缓和了下来，所以已经有免疫力了。

乔依德：好，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分析跟解读。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三位的演讲表示感谢，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今天的沙龙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解读和应对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新情况

系列座谈会 2018 年第 1 期

2018 年 2 月 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临近春节还过来。是什么触发我们考虑组织这个研讨会呢，一个是特朗普上台时我们也开过会，那时整个社会对这事议论纷纷，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当时大家比较关注所谓新三角，担心美国、俄罗斯搞在一起对付中国，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比如把我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看来也不是。总之当时有很多想法。最近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特朗普访问中国以后在 APEC、达沃斯和其他地方的讲话，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至少我们看到在主流媒体或自媒体上，有质量的解读很少。一些主流媒体的解读很浮浅甚至是错的，完全没有理解特朗普讲话的意思。比如对 TPP，特朗普说也可以考虑加入，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对美国有利的话，我们也可以加入。现在媒体上的解读，都把那个前提拿掉，这对社会大众会产生一些误导。我为什么请大家来呢？第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特朗普在中国说了一些比较好听的话，是有重要的改变，还是只不过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支持他？我认为我们中央领导对美国高层还是比较小心的，没有说比较刺激的话。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地缘政治。我最近还看到地缘金融，即美元统治地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请各位专家随便谈，每个人先谈个几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相互的讨论。

刘鸣（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我先开个头，根据我们乔秘书长的提议思考了一下。

这次一系列的美国的行动，看来对我们是出乎意料，没有准备，因为特朗普访华当时应该讲中美关系到了顶点，我们在我们内部评估的时候也讲，中美关系基本上进入了轨道，按照我们设想的四个机制保持互动关系，最高领导人也将继续保持密切互动。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误判，当然我不知道中央的情况。

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反复：应该把这种变化放到特朗普执政一年后其团队逐步开始掌握政策的一个过程来看。比较特朗普竞选时的对华语言，2017年执政时期朝核问题对我们的依赖，要求把解决中美经贸不平衡问题暂时搁置，到现在开始打贸易战，再加上后面的一系列对华否定的战略报告出来，就是一个发展过程。第一，特朗普的理念“美国伟大，美国第一”比较简单化，是一个领导人的直觉目标，到现在为止特朗普还是没有形成一套严谨的像奥巴马这样的战略，他对地缘政治也不是很了解。在他竞选和执政初期基本上就是按照其商人的直觉来表达对国家治理的认识：强调双边贸易平衡，确保美国制造业复兴，就业增加，税收要下降、国内要创新，金融危机后制订的各种管制性法律要取消，减少对企业的政策约束。在国际安全方面，重点是朝鲜问题，对中国其他问题，他关注并不是很多。

在执政初期整个的大半年时间里面，由于人员没有到位，他在领导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用了包括反建制派的班农与其他建制派的人，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人事安排。我推算应该是2017年中左右，他们开始评估中国政策，随着更多的建制派的人到位，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系列人的到位，也正好遇到几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战略，核态势评

估，国防战略等报告需要拟定，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开始重新评估前任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国家战略，提出反映新总统的思想与理念，这包括对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保守的建制派、掌握国家安全部门的军人的理念、利益要求就逐步进入到了未来的新战略中。特朗普不具有这方面战略问题的认知优势，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贸易的平衡与控制移民等问题。这批具有战略头脑的建制派就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评估进行了有机结合，突出美国要关注的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问题。换言之，如果要美国伟大，不是简单的一个贸易平衡的问题，而是需要解决与最大的挑战国家的竞争问题，这个竞争问题既包括军事竞争也包括经济竞争。

最后，特朗普的贸易优先战略与建制派的国家安全长期战略达到了合二为一。也就是说，美国一定要把中国的挑战作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来考虑，制定相应的战略。这个战略当中既要反应平衡贸易的关系，也要想办法解决中国利用不公平的竞争获取利益的问题。这方面所谓问题包括中国以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取了科技、知识产权；中国利用 WTO 多边机制、参加全球化的优惠条件及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了发展的进程，使中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等海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优势。这正是特朗普团队最终制订这样一个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象的战略的原因。

这个调整我不认为是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很多和原来奥巴马的战略是有延续性的，奥巴马也认识到中国的挑战，因为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反映了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应对中

国挑战的考虑。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的方法是加强亚太海上军事力量，经济上在 WTO 之外搞一套高标准的规则，建立 TPP，抵消中国在经济上更大的优势和军事上的挑战能力。

特朗普现在制订的战略，总体上认为原先 WTO 这个体制已经不适合中国这样的体量和竞争模式了，中国利用了这种机构的机械标准与形式上的公平机制来扩大自己的优势。其不同点是：奥巴马是试图在保有现存的多边机制前提下，重起炉灶搞一个多边机制，特朗普则是：

①先冻结、边缘化 WTO 这个多边机制，然后通过更多的单边主义的方式来重新设定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规制。

②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改变双边交往政策来弱化中国的发展能力，特别对中国的科技能力发展的制约，因此美国下一步可能会对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包括学生、学者交流项目制定更多的限制规定，限制中国学者、学生获取美国先进的科技知识、数据、方法。严格审查美国公司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与奥巴马战略相比，新战略的延续性主要是军事的，即亚太地区加强军事力量，包括发展新的盟国；还有延续原来的抵销战略，在军事装备的科技含量上拉大差距。通过这个强化军事分量的战略也使美国军方争取更多的经费。现在美国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缺经费。在资金资源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其军舰与战斗机不可能大量生产，只能在亚太地区通过提高技术含量的方式来保持与中国的军事优势；其次就是实施盟友的网络战略，更多鼓励美国的亚太盟友、伙伴进行双边、多边之间的战略合作，制衡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做法也差不多，不定期进入中国的岛礁 12 海里，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

特朗普新战略最大的冲击，我觉得是两点：

第一，美国不仅仅是与中国打贸易战，而是从长期角度考虑来修正多边体制或是调整中美经贸与投资合作的标准，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降低中国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包括科技上的利益。今天上午我们在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谈到了特朗普的税改政策，由于税率的调整将保证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率，所以更多的美资将返回美国。在与中国合资的企业，美国对技术转让会有更多的限制规定。

第二，原先我们设置的这些双边磋商机制，去年 11 月特朗普来华也认可了这四个机制，美国有可能不再认为这些机制有价值。过去通过经济与战略对话等机制，中美达成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协议，特朗普访问中国时，双方也签署了 250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但美国现在认识到，中国往往通过这些长期性的承诺来拖延矛盾的爆发。因此特朗普和其建制派认为已经不能再受中国这种方式的糊弄了。所以，我觉得今后这些机制如果不完全废除也会名存实亡。他们不会按照我们过去这种方式来对话，搞磋商，搞协议。换言之，这可能会打乱原先我们这套柔性的外交手段。美国将直接把很多问题就提出来，直接让你提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有些问题可能就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双边关系没有发生激化，也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冷淡的状态。

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两年，甚至到他如果连任后面几年都会维持这样的情况。

乔依德：谢谢刘鸣。特朗普从执政初期到中期有一个过程，可能最后他把建制派的国家安全和他强调的贸易平衡结合起来。刘鸣最后指出主要可能有两个冲击。第一，可能有更多的限制，对投资、科技交流和人文交流。第二，原先的

双边关系的一些机制，可能美方不承认。我先说这些。

嘉宾 A（该嘉宾在外企工作，要求匿名）：我先讲一讲，听了刘教授讲的，觉得挺有启发。大家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没有？我读了前半部分，没有来得及读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他说：我们之所以当时跟中国签 WTO 等各种协议，是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成为我们的盟友，说不好听的话，美国是希望和平演变我们，让中国能成为西方民主体制的一员。但是美国安全战略报告写到，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性很小。就是说，你既然不会成为我的盟友，那就是我的对手或是敌人，整个安全战略就不一样了。我以前是把你拉到我这边来，现在发现拉不过来，你要走一条独立的道路，包括你搞“一带一路”、包括去年习总达沃斯讲的新发展模式。中国是要跟他竞争的模式，中国不会成为他的盟友。至少不会像日本和其他西方的传统盟友一样融入它的体系。中国现在就跟美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两种模式的竞争。美国所代表的是西方的那套体制，中国想搞一个新的体制来竞争。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中国对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定位？美国现在已经定位了，把你看成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但是他可能不愿意再帮你。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是什么？是对手吗，还是什么关系？这个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中美关系到底定位在哪里？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最大的打交道的对象。

嘉宾 A：没有人是傻子，美国有很多对中国研究很深的人。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很红的罗斯高，他在中国研究农村 30、40 年，去的村子比中国的领导人都多，中国话可以讲，

中国字也会读，美国有这样的精英，不要觉得我们讲讲人家就信了，这些人对中国其实很了解。

乔依德：他提出这两点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中国到底如何定位中美关系，我觉得恐怕不是特别明确，或者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不同的定位或摇摆。比如最近我们习主席说过，有 1000 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跟美国搞坏关系，这是意图而不是定位。尽管这样讲，媒体上骂美国的还是很多。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媒体对我们党这样做，还会不会存在？不会。你说我们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但是你下面的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当中，基本上还是批评的骂的多，但是它存在。

姚为群（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研究员）：宁可俄国人来杀我们的人，也不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现在媒体还是这个样子。

乔依德：客观的说，美国的政策以前真的建立在希望中国成为他的盟国吗？你仔细看，也未必，可能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想的，其实大部分政策并不如此，而是希望跟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

张立平（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实际上六四以后就没有这样了。

乔依德：最早跟中国搞好关系是因为当时的战略，当时的需要。这个报告出来没有几天，布鲁金斯有一篇东西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当成敌人。因为现在特朗普上来，总归是把前一届说的很糟糕很幼稚，这里面有这个味道。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现在是有一些变化，这个也要承认。刚才刘鸣讲的也对，以前有很多的东西只不过亚太战略转型，对中国还是防，而现在更突出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以往没

有这样讲，奥巴马说是伙伴。刚才讲的我也很同意，特朗普有很大一部分还是继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他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一定能够落实。现在说印度太平洋战略，最早提出的可能是日本，但是真正怎么落实，跟以往有多大的区别，现在还看不出来。美国可能想把印度拉过来，但是印度也不是傻瓜，当然印度对中国也是提防的。我上次参加一个会，参加过中印边界谈判的那个人在会上讲，现在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不仅仅是边界问题，这是小问题，我们不清楚中国战略到底要干什么？我就插两句。

嘉宾 A: 我补充两句。乔老师讲的对。我在美国待了六年，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是美国人是很实际的，他的政策都是按照需要的来，他没有中国人的交情这一说。举个例子，在中国你跟你老师可能是一辈子的朋友，美国人不一样认为，你读完了书，我，打交道少了，就渐渐冷落了。美国人都是按照实际需要，很现实。比如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美国就和你打交道，现在格局变了，美国就会转换策略。

第二，美国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包括奥巴马也讲：我们一定要做世界第一，这是很明确的。任何美国总统都说我们一定要做世界第一。一旦他看到有人要追上他了，当然对他是一个威胁。美国不像英国一样自动退出老大的位子。美元起来之后，英镑位置让给美元，美国现在不会这样，美国是要做第一的。

还有一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是在变化的。这里面反映了美国两党对中国政策的不同定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猜想，民主党还是倾向于把你拉过来和平演变的

想法。但是共和党特朗普这种人，就是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要跟你斗，竞争，竞争中见高低。可能这是他们两党对华政策不同的方面，就像咱们国内对美政策也是有分歧的。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特朗普第一年，我们对美关系处理得是比较好的。这个意思是我们的目标比较明确，我们着眼于稳住中美这一事关大局的关系，力争对美关系能够比较平稳地过渡到美国新行政当局的执政时期。具体措施包括较早地在4月份实现中美元首会晤，没有等到7月份到G20汉堡峰会才会晤。然后就是11月特朗普访华，我们给予了极大重视，做了精心安排，这是对方能感受到的，包括他讲的话也能够反映出来。总的来说这第一年的情况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总体平稳的态势，在这样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上台后，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同时我们对于达成的协议、双方讲的一些话也不能估计过高。刚才2500亿已经提到了。特朗普说，我和习近平主席有“great chemistry”，用中文讲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听到这样讲还是蛮高兴的，做特朗普本人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现在进入第二年了，有了新的情况。12月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来，值得认真研究。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个报告。从字里行间和所使用的语言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词用了多少次，例如“compete、competition、competitive”就用了很多次，意思很明白，就是美国已经准备好来竞争。竞争的对象中国出现在很高的位置上，很突出的位置。可以肯定特朗普没有看过这个报告本身，它反映的是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

同时报告又要反映现任总统的一些思想，包含了这两方面的要素，反映了今天美国执政精英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政策思想和战略思想，所以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这个报告当中所写的是不是就是美国的政策，是不是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这个还不一定。因为它的这些政策思想和战略思想要变成具体的政策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也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里面又有很多问题，是不是能够变成具体的政策，能不能落实、执行，这个我们要密切关注和跟踪。再加国防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要结合起来很好的研究。这是第一。

第二，前面乔秘书长说到 CPTPP（又称 TPP11），去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第三天就宣布退出 TPP，然后各种媒体上声音一片，就是 TPP 已死。但事实是 TPP 没有死，除美国外的 11 国还在继续。一段时间来在对部分条文进行重新谈判，满足一些成员的要求，比如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的一些要求，本来是争取 2017 年 11 月份在岷港 Apec 会议上要完成的，后来加拿大提出了其文化产品保护的要求，NAFTA 也在重新谈判。现在比较明确了，今年 3 月 8 日要签字，然后就是特朗普在达沃斯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如果 TPP 成为一个“substantially better deal（实质上更好的交易）”，他愿意回来，好像是他又有变化了。但他这个变化是有条件的，也即什么是“实质上更好的交易”，这个要由他来判定。而将来达成的这个交易是不是能够满足特朗普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这边，好像是有几年对 TPP 谈判特别重视，现在好象有了“一带一路”以后，这个对我们不是问题了，好像

不重要了。

乔依德: 媒体往往总是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好的，总认为这个 TPP11 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成功了就没有声音了。

任晓: 还有关于朝鲜半岛，这是地缘政治。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国内出现新的争论，一个新的说法叫“bloody nose (流鼻血)”，就是对朝鲜进行有限军事打击。政府内部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为首的一批人在筹划这么一个方案，进行有限军事打击的方案，主要是针对朝鲜的核和导弹设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美国有没有可能通过有限打击摧毁朝鲜的核能力而又不引起一场全面的战争？存在很大的反对声音。最近平昌冬奥会，韩国人比较兴奋，好像既然朝鲜派出运动员和代表团了，而且是高级代表团，又要韩朝运动员要同举一面旗帜入场等等。我觉得金家三代是很会玩这个的，主要着眼点是分化美韩。等这件事情过去，平昌冬奥会过去，还会是老样子，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看今年整个上半年。再回过头来说，美国副总统去韩国也一定程度上是要牵制韩国人，不要以为南北关系就怎么样了。

从我们这边来看，前两天商务部宣布一个新的措施，限制对朝“两用”产品出口。对朝制裁措施在今年上半年会继续发酵，其影响有必要密切关注。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是在特朗普的压力下采取对朝制裁措施的。这个看法有点偏差，有这个因素，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对朝政策上经过多年的徘徊之后也有了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

冯军（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我来的晚了，抱歉。这个题目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都在讲。我总的感觉是，美国在 20 年前是考虑把中国打成一个可能像日本那样的国家，最后这么多年发

现，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日本的模式，不管是制度上还是实践上。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美国往往在民主党的时候打压中国还厉害一些，共和党跟中国更可以做一些交易，这是一个大的情况。我觉得从战略来讲，中国基本上没变，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但实际上始终把美国作为战略对手，我们就是没有公开这么讲，一直是这样的。这就是刚才老乔讲的，如果有人天天这样骂共产党，早就抓起来了，但是天天这样骂美国没有人管，这反应了一种现象。我的理解是，在宣传媒体或管制措施上实际上是有一种默认的，不是可以随便骂谁，你如果天天骂俄罗斯可能就不允许你这样做。这是我的一个考虑。

第二点是实践，战略定位的实践。我们战略定位很清楚，我们是用包括采购团、会议、愿景等等是我们得心应手的东西，有一个大单子，像招商引资一样，我签了多少多少，这是我们比较擅长的这一套。特朗普骂中国的话很多，有时候也说几句中国的好话。但是我们搞国际关系的人一看他说好话就感觉很高兴，说坏话就不愿意相信。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存在，就看他怎么走，有的时候他实际上真的动手，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特朗普的实践又不像政治家的做法，他很明确说不能让中国有这么多好处，要让他出血，最过分的就是台湾问题都可以给你搞，什么都可以说。一年过了以后，特朗普现在语不惊人誓不罢休的已经很少了，大嘴巴已经很少了，他也在变，也在成熟，不像一开始那样什么都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会引出很多的麻烦。

中国的实践，在中美战略定位和中国国际战略定位上，我的理解是用一种很柔和的、微笑的方式，对外宣布我是与

人为善的，我是做好事行善的。但是实践中，不仅东南亚、印度、美国都不停地在提防我们，南海的岛屿我们认为是不可能让的，中日的钓鱼岛冲突也好，中日的分界线油田也好，我们在实践中是不含糊的。这个也对，为了国家利益所有国家都这么做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在有的做法上我们可以更缓和一些，在国际上可能更有效一些。

“一带一路”，原来我的理解就是对冲 TPP，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伟大的战略了。实际上沿着“一带一路”西面这条线问题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很少去讲问题，新疆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新疆以西的中亚更难处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平时能看到最多的，是媒体的欢欣鼓舞，在地图上画圈，我觉得这可能会产生误导。我们现在在谈进一步开放，进一步签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实际上，国内的利益集团在这个方面的让步是很难的。因为你要进一步开放的话，有很多利益的交换，但是很难做。

以前美国人讲华盛顿共识，后来华盛顿共识可能全球很多国家都不认。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要推什么？命运共同体很大，我觉得还是要有具体的支撑点。现在“一带一路”更多的是做生意，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援助，这个东西雄心勃勃也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英国更实际，说看一看有没有生意好做。美国人就是很明确地遏制你，现在就把你作为战略对手。

姚为群（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研究员）：大家都讲的很好，正好这几位都点到了 TPP，希望大家经常关注 TPP 这个事情。美国所有对外签订的政府间协定，都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评估。对 TPP 的评估，就是对制造业、就业和增长是有影响的，是负的。特朗普看到那个东西，马上

把它灭掉了。为什么呢？中美关系首先是各方的内生问题，特朗普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最多只能做八年，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很清楚，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他连任，他已经在筹款了。

我们所有的行动，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是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们经济发展以后发现，胡温时代党的政策不出东南海。我们的目标是中国梦，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改革开放也好，中美关系也好，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特朗普很简单，他说我就是为了连任，首先要找到票仓，稳定票仓。我上午也讲，我们去了通用汽车，去了福特汽车，结果是劳方和资方一起出来接待我的。特朗普必须解决传统制造业的就业问题，怎么办呢，从货币和财政政策上采取加息和减税，外交政策到处点火，到处制造矛盾，朝鲜半岛是一个点，其他的也是。美国现在已经出来一个政策，还跑到沙特制造矛盾，又跟土耳其搞事情。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恢复制造业的就业。

我们认为美国正在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展示了我们的 2025，什么制造业都搞世界第一，可能吗？苗圩部长讲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才是第三梯队。特朗普认为中美的核心问题是，他当政一年贸易赤字没有降反而升。如果贸易赤字降几个百分点，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不一样了，结果没有，升上去了，而且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他在今年 1 月 16 号的报告里说，世贸组织的规则控制不了或规范不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巨大经济体。我想到 1987 年杨小凯说过，中国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是会影响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领导人心里想的，也是中国第一。

有人给我讲了一个事，任何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不能有华人，一回国就是钱学森。所以现在给你限制，包括 STEM 都不让你学。美国就是一个一个靶子对着你。十九大又强调国有企业的地位，他们说那美国的董事会是不是也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的领导也很着急，说怎么样改变一下，让我们的海外企业把利润汇回来，那你也学美国啊。

中美关系绝对不能搞坏，大家是相互离不开的，要打交道的，但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今天我们也不用担心，杨洁篪国委员就在华盛顿，他为什么去，总是有道理的，总要去做一些交易。我们商务部的余建华也调到日内瓦去了。

“一带一路”我补充一下，我们谈了几个国家，造成了俄罗斯很大的不高兴，其中一个格鲁吉亚，是俄国的死对头。在金砖国家里，我们又搞金砖自贸协定，巴西说可以搞，但是要带上我们的“南方共同市场”，什么巴拉圭、乌拉圭。南非说可以，要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国家也拉进来。这就很麻烦了。

2014 年 APEC 会上，我们推亚太自贸区。刚美国往后退，因为美国官员不敢决定。我们带着其他 19 国一起往前推。后来美国人说要研究国有企业问题，这个时候整个风云转换。过去是我们 20 个对美国，现在反过来是美国带着其他 19 国对中国。因为里面有很多 TPP 成员，包括越南，国有企业条款都已经承诺了，所以中国反而成了问题。

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乔依德是不是可以直接反应到领导手里，很多东西被我们的中办、国办截掉了，不适合领导讲话的都上不去，从胡温时代就这样，你说怎么决策？我就讲这些。

乔依德：为群讲的很好，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其实很

重要。特朗普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总统中对这点最敏感的，他所有讲话中从来不要忘记攻击前一届，以前的总统不太会这样做。在竞选的时候他们会讲前面的总统不好，但当选之后就很少讲了，而特朗普时时刻刻不忘记，任何事情都是前面不对。

张立平：我接着为群讲。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原来邓小平的判断，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这样。美国在六四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中国有可能演变为他的同盟国，但是六四以后，实际上美国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能。中国也知道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也从来没有期望美国会真的让中国崛起。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毛主席也是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现在习主席提出跟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对抗。特朗普上台时对中国的攻击很厉害，习主席基本上不讲话，就是不希望造成一种很明显的对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需要分析美国的智库、专家、精英在他们提法上的变化，需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不对抗。我觉得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关系只要不对抗，维持下去，对我们就是最大的益处。今天这么多专家，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扔掉了？

冯军：我觉得这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特朗普在国内需要树立这么一种形象，我是很厉害的，我是很伟大的，我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号召力。这是我的理解。

乔依德：下面接着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包括多种角度，比如说怎么跟美国打交道。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央对美国还是一个冷处理。我们国内改革开放怎么跟外面结合起来，还有外面的行为模式怎么跟国内的东西不能矛盾

太大，不能张力太大。这里面我想大家可以提一提。

姚为群：美方公开声明，WTO 的规制控制不了中国，我们要用国内法。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讲互惠的问题，互惠（reciprocal）应该翻成对等。

乔依德：我本来就想讲这个事。一财的女记者写了一篇东西，我给她发微信说：你们对“reciprocal”有没有统一要求翻译成“互惠”？那时候达沃斯会议开完了，她在机场，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不翻译成“对等”，这是美国最想表达的意思。

姚为群：公平贸易、互惠贸易，这都有的。当然现在，而我们也用过“对等”。中国在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里有一条，“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但是我没有找到英文版。反过来美国就讲自由、公平、对等、互惠，互惠有点褒义，对等比较贬义了，觉得一个柔一个硬。美国国内早就有了，美国 1934 年就提出要求“自由公平对等”的《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所以这是美国老的理念，只是美国当时因为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美元和黄金挂钩，通过马歇尔计划确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现在美国基于国家利益要求公平贸易。我们调查下来，他可以采取的强制执行手段有：301 调查，知识产权，可能还有超级 301，还有 201 全球性的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非市场经济地位，还有就是美国工人优先、就业优先，还有反规避 337 等手段。这些武器我们都要看一下。

还有一个外资审查，现在外资审查最厉害的就是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我昨天跟商务部的一个老同志通电话，他说这个蛮讨厌的，彻底影响先进技术走出去的问题。一旦与国

家安全和知识产权挂钩的，中国是来不了的，要受到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以前只审查进去的，现在出来的也审查。我就想到去年张江有个研发中心撤回去了，也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原创这一块都走了，把临床的部分放在这里。这跟我们讲中国制造 2025 的关系太明显了。美国针对我们的几条，包括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还有政府主导经济，我们都要有明确的态度和行动。我们不是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吗？为什么我们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里搞上钢集团？另外知识产权也应该有一些措施，正文里说的很好，但是附件里都有强制知识产权转让的内容。后来李毅中和苗圩没有办法，说让王新奎他们去做合规吧。我们有一种国内、国外两张皮概念，所以我们搞电子商务跨境，首先国内立法先行。我们要把挑战变成改革的动力，我们历来都是这样化解的。当时我们跟外国人解释，说你看我们浙江民营企业多好，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上海有知识产权法庭，全国每个中级法院都应该有一个知识产权法院。特朗普跟奥巴马都是举例子，我们十九大报告只有说教，没有案例，然后又天天在电视节目解说，为什么十九大报告不能生动化呢？另外对外宣传的用词也很重要，你可以用他的词，但是把你的案例配上去，外国人还是可以接受的。

乔依德：姚为群讲的很好，有句话现在报纸上很少看到，就是“把外面的压力转化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动力”。上次开会我甚至跟一个人争起来，正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那人说“韬光养晦不对”什么的，那时候就开始了，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当然这个后面有深层次的原因，刚才冯军也讲了，我们就不展开了。我对一句话非常感冒，就是说

“49年我们站起来了，改革开放我们富起来了，现在我们强起来了”这里面问题一大堆，你那时候站起来就一定不是强起来吗？抗美援朝那时候就不强吗？现在我们已经富起来了？还没有吧，现在是中等靠上收入的国家，还没有到高收入。这个口号我是看到很多人讲，主要就是鼓励对外要强。我也很同意立平书记讲的，不一定提“韬光养晦”这个口号，但是你心里要有数。王新奎有一句话，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满对的，他说，“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你调子这么高，还跟外面说你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你跟人家谈的时候，人家是把你当作发展中国家来谈的，所以就不强调对等了，这个很重要。

姚为群：另外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权力很大的部门都不是直接涉外的，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常被人家骂汉奸，但是谈判都是由他们去谈的。

冯军：现在宣传部也是很厉害的。

姚为群：所以内外两张皮，我认为发改委还是要撤掉。

冯军：电视里看到湖南的宣传部长贪污了多少，宣传部下面有很多文化媒体。

任晓：我认为要改变一下现在过热的一些宣传，比如“一带一路”。要看到“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东西，要在一个很长的过程中逐步建设积累，才能够逐步成型的一个东西。现在很多说法、很多做法，就不是这样了。

再比如说十九大以后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也不尽妥当，比如派这么多宣讲团到全世界去宣讲，可能有点过了。你一边说中国不搞输出什么，一边又这样大规模宣讲。也许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韬光养晦，当然怎么表述还可以斟

酌，我们也不是一定非使用“韬光养晦”这四个字，可能有更好的表述办法，然而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美国当今这帮执政精英已经很警觉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报告也反映出他们有一种紧迫感，担心中国这样的崛起势头会危及其支配地位。他作为老大当然想要确保他的支配地位或首要地位，有新的力量出现，他当然不愿意了，当然要有反应了，这种反应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我认为台湾问题今年会有新的情况，在包括经贸等问题上都会表现出来。今年恐怕问题不会少。

嘉宾 A: 刚才讲的很好，就是中美不要对抗。上次在北京开会，龙永图也讲总要跟老大搞好关系，老大就是美国。我们怎么不搞对抗，这是一个问题，内外都要结合。当时美国和苏联对抗的时候，美国跑到中国来，他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他。现在如果美国想跟我们对抗，我们又不能跟他对抗，怎么办？要看看我们能找谁。你现在看看，俄罗斯的力量，经济上已经不是一个像样的大国了，但是军事上很强，俄罗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口碑也不好。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我不是研究对外关系的，但我有一个感觉：日本人急于跟中国修好。日本跟中国有很多的历史恩怨，我们都知道，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和日本合作。跟日本迅速搞好关系，会对中国做美国的工作有好处，等于瓦解了他在亚洲的统一战线。日本、韩国是他最重要的两个盟国。

姚为群: 但是我们现在和日本韩国两个国家又抗起来了。

乔依德: 对，跟日本现在有这样的苗头，很多部门之间协调。但你潜艇到钓鱼岛那边一转，他态度又变了。日本是

很强烈地希望跟中国搞好关系的。

冯军:这里面有一个基调定位的问题。萨德最后你也搞不定，你去打压韩国，最后萨德还是布置了。最有意思的，我们打压了韩国，但不打压美国，萨德是美国人放的。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始作俑者你不整，捡了一个软不放的，这个事情就很怪。这个国际政治战略我觉得太怪了。还有钓鱼岛这个事情，搞到这么大的一个地步，不惜一切后果的。实际上如果中日韩在东北亚联手起来，对美国来说远远比你这个崛起更可怕。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很难做，三方各有心思，美国人也不愿意让你这样做。

嘉宾 A:所以我们要主动，回到邓小平先生的话，什么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不是空话。就是对外要调整一下，特别是对日策略，看看哪些国家我们能拉过来帮助中国不要跟美国对抗。内部就是我们要做各个部门的工作。我是外行，我觉得我们这两年外交工作很被动，朝核问题，香港问题，中国在外交上这两年其实是很孤立的。要么就是用钱买来的巴基斯坦。谁是中国的朋友？几乎没有。俄罗斯吗？说不定更不是朋友。我在香港工作了六年，我讲一下香港的事。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 1997 年之后香港的统治权交给了李嘉诚等大地产商，香港有很多中下层的人，这些人大多是六七十年代逃去的广东人，他们受尽了香港大地产商的剥削。我们把统治权交给了这些大地产商，这些中下层的老百姓日子更难过，这就是香港目前问题的根源。外交上我觉得要反思，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都要反思。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你是跟穷人站在一块，还是与富人站在一块？香港的主要矛盾不是香港和北京的矛盾，而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那些中央驻港办的官员，从来不做群众工作，从来不

看看香港普通人民在干什么，就是跟那些富人们混在一起。你看朝核问题，中国有多被动，左右不是人。我们的目标是朝鲜无核化，现在也达不到这个目标。

乔依德：上次我们请了沈志华来，他也讲到这一点，我们把北朝鲜看成是一个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实，萨德问题，韩国有很多人对中国做法有很大的看法。你对一家公司这样弄也没有必要，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冯军：外资看到你这样完全不按照法律做事情。你当年招商引资的时候，说按照规定。萨德这个事情，你让一个韩国企业说我要反对韩国政府，他怎么做得到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不对抗，有的地方都应该学学日本。日本政治家都不和美国硬碰，日本是以利益为先，只要拿到利益，大的调子给你美国人算了。我们同学都在说，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人如果不允许的话，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都不敢去。我们在这方面一下子搞得很复杂。中日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历史问题，我们有要学学美国人，美国人就是不在乎，这是你的历史问题，我就不当你一回事，你去好了。

乔依德：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基金会是这样的，我们有自己的追求或特点，我们不跟政府唱反调，我们总结一些建设性的东西，通过一些渠道送上去。一些给我们赞助的民营企业，说看了你们的东西都还不错，你们讲真话。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

系列座谈会 2018 年第 2 期

2018 年 2 月 27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春节刚过完就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这次是小范围的圆桌讨论。大家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有些人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徐明棋：我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

王红林：我是挪威主权基金的经济学家。

何知仁：我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闫彦明：我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总部。我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丁剑平：我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李蕊：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乔依德：那我们就开始，关于这次圆桌会议的一些具体东西，我预先发给大家了，我们有 6 个题目。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们基金会有各种形式的多种活动，有的是请一个人在沙龙上对一个专题作演讲，有的是大型的研讨会，另外一种像是这样的小范围会议，有的议题可能比较敏感，有的是热点问题，主要是觉得小范围能谈得比较深入一点。这次圆桌讨论的题目是“理解和应对全球金融格局新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差不多 10 年了，相对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应该有很多变化，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怎么产生的，影响怎么样，怎么来应对，这是个大的框架。我们 2016 年做的课题是“全球金融治理”，今年做的课题是“全

球金融失衡”，这跟以往我们对全球金融的宏观的看法有很大关系，这是大的一个框架。

前不久美国股市大跌，去年美元指数实际上是下跌的，这跟一年多以前大部分人的预测是相反的。那个时候，人们觉得美国要逐步退出 QE，资金可能从全球其它地方流到美国，可能会推高美元指数，但实际上美元指数去年是下跌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QE 的退出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刀切，而是可能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带来不一样的影响。这是考虑开这个会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触发因素。我们拟了 6 个题目，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兴趣和方向来谈，今天是一个初步的交流，以后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行比较大的研究。另外一个背景是全球经济复苏，但是一些结构性问题，包括金融方面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国际上有很多人做了一些报告，美国彼得森研究所也开了研讨会。我想我们这次也需要对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然大家可以从当前的事情谈起，但我们今天的会不是预测下个月汇率走势怎么样，而是从政策导向这个角度来考虑。

我就简单讲一些开场白，下面大家可以先发言，大概 10 分钟，然后进行讨论。徐明棋你先带个头吧。

徐明棋：首先，我个人的观点是，全球经济不是现在才复苏的。好多人认为全球经济 2017 年才复苏。2009 年危机之后，2010 年在大规模刺激之下，经济复苏是达到一个高位的，随着大规模刺激逐渐释放掉，经济增长开始逐渐下滑，主要是欧洲经历过两次回落。因为美国增长不稳定，全球整个来看增长比较乏力，所以人们认为始终经济处在危机当中。实际上这个观点不正确，全球经济是在不断复苏，

但是复苏乏力。

随着各种刺激因素的逐渐消失，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2014年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虽然没有加息也没有缩表，但刺激的动力没了，这个时候经济就开始有明显往下走的趋势，2016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度下滑到1.5%，在这样的情况上，人们普遍感到世界经济好像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从2017年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步的恢复、增长。美联储2015年和2016年各加息一次，非常谨慎、缓慢。但2017年连续加息三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有了信心，从2017年开始，经济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因此常常有人会说，2017年经济开始复苏了，这实际上是新闻媒体的说法。从经济学准确界定来说，从危机的负增长走出来就叫复苏，现在应该叫经济回暖，这是一个大的基本评判。2017年美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加上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和减税法案获得通过，美国2018年的经济前景是被看好的，因此人们对整体的世界经济的乐观情绪也在上升。

再加上欧洲最近刚刚公布的经济数字，2017年的数据居然达到了增长2.5%，本来一直说2.1%-2.2%，因此2018年被认为也是2.5%。如果他们达到2.5%的话，欧洲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可能会提前结束。因为经济增长到2.5%了，而且通胀也开始有往上走的迹象。这是大的背景。

接下来讲到金融这块。金融毫无疑问，受主要货币发行国，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当然主要还是美国的影响。很多研究证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的扩张和收缩起决定性作用。美联储2018年到底加息几次存在争论，因为美联储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歧，未必是人们预料的加3次。12月份投票的结果实际上是分散的，是2到

3 次之间，假如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比较乐观，通胀开始起作用了，那么 3 次是比较可能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股市开始调整了。美国股市为什么调整？我判断就是因为有比较大的泡沫，这点得到人们的担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缩表和加息不断推进，这对股市肯定有不利影响。当前来看，虽然加了一次息，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缩表，但对美国国内的流动性的影响是不大的，M2 仍然在增长。客观的货币需求增加了以后，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M2 是可以增加的，尽管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 年上半年美联储仍然加息，而且不断有好消息出来，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就提前释放了，美国的股市曲线是非常陡峭地往上走的。2013 年那个时候，美国经济还没有真正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时，股市早就创新高了，纳斯达克更陡峭，标普 500 在 2013 年下半年开始超过危机之前的水平，然后一年一个高，创历史新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持续的话，未必能支持美国股市的乐观情绪。原来担忧的情绪提前释放。

最近中国说股票注册制往后推两年，刘士余对媒体强调是外部因素。实际上我的判断是，这说明现在国内一般性的官方判断是：现在美国股市有调整的迹象，大盘压力比较大，溢出性冲击对中国可能有不利的影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是稳妥一点。现在美国股市处在一个大家公认存在泡沫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在收缩，流动性如果收缩过快，那么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是一个大概的趋势。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我个人判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缩速度很可能会放慢。特朗普说美国 GDP 增长要达到 3%，这是不太可能的，国际组织普遍预期美国今年大概的增长率是 2.5%。如果 2018 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不是很理想的话，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不放慢，再加上减税，必然导致美国政府赤字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廉价的货币支持政府债务，肯定不希望美联储快速提高利率。快速提高利率可以支撑美元的汇率，对美元汇率理论上好的。原来担心美联储一加息，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生金融动荡、危机升级的情况没有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压力提前释放掉了。耶伦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事先都有很明确的预期，所以都释放掉了。另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来说，逆差的规模很小，基本上平衡，有的是顺差。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基本上比 2001 年的时候上翻了一番，整个市场相对比较稳健。

美联储如果接下来连续、快速提高利率，还是有可能引发资金回流到美国，但对这个前景我个人是打问号的。特朗普也认为，现在的汇率下降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所以我个人判断，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短期金融振荡会增加，但是不至于会引发像 90 年代末和 2003 年的那一波动荡。那个时候格林斯潘迅速地把利率不断提高，导致出现所谓资本逆流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个人觉得，金融市场的全球波动性会增加，但是不至于再次引发大的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美国也好，欧洲央行也好，包括我们中国，大的方向是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渐回归中性，回到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流动性应该会偏紧。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步走向中性，但经济主体对未来的经济判

断是比较乐观的话，货币的内生性可以继续创造出一定的流动性。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负债率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不断走高，现在开始到顶了，不可能继续扩张，也不可能再继续吹大资产泡沫。但是资产泡沫是不是会迅速收缩？我个人看来，在 2018 年 -2019 年，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 2019 年以后，大概是 2020 年的事情，我现在判断是 2020 年，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波调整。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说，2009 到 2019 年的 10 年差不多该结束了，那个时候尽管拖的时间比较长，收缩的累加效应可能要爆发出来，前一个阶段的大规模扩张可能需要通过一个危机式的振荡调整，大的趋势是这样。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说句老实话，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小。我们 2020 年的目标正好是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开放，接下来各种各样对外的大目标，都要去推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断积累的叠加效应。那个时候如果外部有明显收缩，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问题就会被延缓，所有的政策都要推迟。国内现在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在银行表外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之下，现在要收缩，收缩起来马上担心会发生风险。现在你看资管的新规推到 2020 年实施，一系列的规制也是到那个时候来实施，国际上也是那个时候，所以 2020 年可能是一个坎儿。

抛砖引玉我先讲这么多，谈到具体问题再来发表观点。

乔依德：小何你讲讲，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是哪些？

何知仁：我把自己对经济观察的体会跟各位老师汇报一

下。我今天主要谈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及其复杂性。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是 2010 年以及之前比较多，主要是两大类，一种叫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通过货币贬值提高竞争力，把邻居推到沟壑里去，靠这种方式给别的国家带来负的外溢效应。

还有一种是与邻共荣，比如说美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给其它国家带来好处。主要逻辑我归纳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条，一是全球的政策协同，美国如果采取宽松的政策，其它国家会很快跟进。如果美元贬值的话，其它国家也会采取竞争性的政策，不让自己的货币升值，这样的话，大家的需求都会好。还有一条是美国国家的特殊性，他本身是消费拉动的国家，他自己的经济内需好起来，带动其它国家的外需。从金融角度来说，美国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他的货币宽松会给全球流动性创造宽松的条件，使得外贸需求有所好转。还有一条逻辑是我自己说的，人民币汇率是盯住美元的，现在虽然不是了，但是在危机那个阶段，2008-2009 年人民币从升值又回到盯住美元大概一年多时间。如果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这也是支持与邻共荣的，因为美元贬值人民币跟着贬，这样中国的外需和竞争力也会上升，中国好起来的话，也会把全球其他国家带好。所以从这三条来看的话，与邻共荣也是有道理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危机前，包括 2010 年以前，全球经济的各个国家，主要是欧洲、美国、中国、日本，经济走势基本上都是协同的，更加支持与邻共荣的逻辑。但是 2010 年以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走势就不太好了。比如说 2010 年以后，日本和美国仍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而经济

比较好，中国和欧盟的经济是往下走的。欧盟和中国也不一样，2013年经过一番反弹以后，中国经济又往下走，欧洲的经济持续的往上走。

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势在2010年以后协同性下降，也有结构性的原因，比如说欧债危机、中国有产能过剩等原因。但是从外溢效应的角度来说，与邻共荣的逻辑是削弱了。2010年以后，各个央行货币政策的协同性是下降的。2010年底到2011年初欧洲还加息了，而美国一直是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国在2009年、2013年、2016年都采取了经济刺激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呈现出独特的波动。总之，政策协调在2010年以后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大家对量化宽松的分歧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条，现在不光是美国在拉动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我去年看过中国经济指标和全球经济指标的一些关系，在工业增加值、制造业PMI、工业库存等指标上，中国的指标从落后全球慢慢变成领先全球。原油价格在2010年以后主要是跟中国的经济比较相关，在2010年以前主要是跟美国的经济比较相关，这说明中国经济外溢效应的增强会削弱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人民币原来是盯住美元的，现在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弹性扩大了，这样的话也能够抵消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效应。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在与邻共荣这方面的效应是减弱的。所以总体来说，外溢效应更加复杂了。这对中国而言，有一定的好处。外溢效应复杂化以后，美国的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然而欧洲因为考虑到日本的通胀还没有起来，可能不会很快跟进，欧洲2018年可能逐渐退出量化，但是估计不会加息。日本2018年退

出量化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2019年有没有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经济对中国的外溢效应有一定的降低。

就中国而言，还有一到两轮的政策空间。中国现在的对策是抓住这两年的喘息机会，集中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完成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如果不抓住这两年美国、欧洲、日本货币政策都偏紧，中国以后就比较被动了。中国还有和欧洲、日本、美国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不一定要一样，但是要协调好哪个国家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什么幅度的行动。

我刚刚讲到的外溢效应是从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刚刚说到美股，能看到的是美股的波动对全球贸易的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如果美股继续调整的话，对全球贸易肯定有很大的打击的。我暂时讲这些。

乔依德：请王红林讲一下对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考虑。

王红林：我们是资本市场的机构，了解的信息可能比较国际化，因为我们属于每天都开很多会的这种，大家互相商量。我谈谈从国际投资者角度怎么看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

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在这边其实还是领先了一步的。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发生了挺多的变化，有一个显著变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就是我们提出的“双支柱”理论。欧洲央行只盯住通胀，美国盯住两个东西，一个是就业，一个是资产价格稳定。

中国原来的货币政策基本上类似于美联储，当然我们有四个货币政策目标：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其中是有优先顺序的，周行长多次提到价格稳定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是有一点咱们和美联储不一样，中国金融

体系跟欧洲更接近，我们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国货币政策老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按照大的目标应该跟着美联储走，但是金融体系有点类似欧洲，到底货币政策框架是欧洲为准还是美国为准？我们基本的体会还是以美国为模板，欧洲可能作为一个参考。

欧洲做的比较简单，这可能是德国人的传统的，你就业出现了问题不是我中央银行的事情，比如就业出了问题，或者经济增长出了问题，打不了我央行的板子，但是通胀出了问题就是央行的事情。

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双支柱概念，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的央行还有另外一个支柱叫做“宏观审慎”，这个我认为在全球是首创的。为什么提出双支柱概念呢？这里有我们国家央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危机发生之后，国际中央银行界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很多反思，有一个关键问题大家一直讨论，还没有定论的：中央银行是不是要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这是不是要考虑的范围。我们也跟中央银行经常交流，美联储说那只是参考指标，但不在管理范围里。欧洲银行更不用说，资产价格除非影响了通胀，否则也不在管理范围。中央银行的框架跟以前基本类似，没有做出大的调整，反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做出了大的调整，当然这和几年前的股灾、钱荒、影子银行等有关系，也有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货币政策的反思。

为什么中国的中央银行要搞一个双支柱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有那么几个渠道，最主要的是利率渠道，当中央银行升高或降低利率的时候，光用利率政策能不能很好地调控房价？房价开始有泡沫化的趋势，光用货币政策能不能阻止房地产泡沫化？其实有一个很好

的例子，大家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没有货币政策，它的货币政策是美联储定的，但是香港金管局有很多所谓的辣招。但是看看香港的房价，从 2003 年 SARS 最底部，到现在已经涨了 450%，远远高于 1997 年的峰值了。香港金管局可以说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也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对房价实际上是非常担心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用一些辣招，因为利率不是它能调控的东西。

这说明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没有货币政策可能是没有办法阻止房地产泡沫化；反过来讲是不是只要有货币政策，没有宏观审慎就能阻止房地产泡沫化呢？答案是：是也不是。

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到房地产泡沫化之后，你提高按揭利率，当然可以把房价压下来，控制 M2 增长速率当然可以把房价压下来，就像现在一样。比如上海市如果房价增长太快，很简单，把按揭利率一直提，房价肯定下来。但是它的副作用很大，因为利率政策是对全社会各个行业都适用的东西，你把利率提高之后，对其它的经济部分可能伤害会很大，所以利率杠杆是非常大力的、非常粗的一种杠杆，把资产价格压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经济体其它部分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现在一样，没有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往往容易滞后于经济发展，这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加息时大家喜欢叫苦，因为你伤到一些人，他们就开始喊，政策决策者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谨慎的。第二，经济体里有很多摩擦力，我的理解是这样，货币政策是一个对全社会都适用的大杠杆，但是每个部门的资产回报率是不同的。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对一个高科技行业加利率到 10% 可能都没问题，因为它的资产回报率可能有 20%，但是你

对一些 3%-5% 的低利润企业，利率加到 10%，它马上就受不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的摩擦力不能被很好地修复？你把利率提高之后，资源应该从低利率部门向高利率部门流转，这样的话运用利率工具就可以很好地调节经济。但实际上不是，在经济体里有很多摩擦力，你加利率上去已经损害了一些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的调整可能在 5-10 年后才会发生。因为很多摩擦力，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完善的，这时候就需要宏观审慎。宏观审慎就是像微调工具一样，如果这个行业不行，就给这个行业松一松，所以宏观审慎是一个比较微观的东西。货币政策作为宏观工具和宏观审慎作为微观工具结合起来，这样可能对经济的平稳运行有更好的调节。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双支柱框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体里的扭曲比发达国家里面要多，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微调的宏观审慎工具，来让经济更平稳运行。这就是我对货币政策框架和宏观审慎的看法。

乔依德：谢谢上面三位，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因为下面两位主要是讲中国。

我们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讨论一下。我先开一个头，对大家讲到的或者没有讲到的一些想法，我们这次题目当中也讲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好像中央银行的作用显得非常大。我们去年开会的时候美国一个老外用了三个前所未有，其中一个就是央行在危机以后的作用前所未有。

为什么央行的作用会很大呢？我想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以前比较单纯的目标，特别是刚才红林讲的通货膨胀的。尽管现在范围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考虑了资产价格和外溢效应。我记得前两年开会，很多人辩护说我们的

授权范围里没有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授权就是管我们美国的事。但是实际上耶伦去年讲话也考虑了，外面的经济如果不好，对美国经济也会有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体量那么大。所以现在尽管还是说比较单纯的一个或两个目标，但实际上考虑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中央银行显得作用很大，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常说央行是最后贷款人，它是要起作用的，我想不单是美国，其它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第三个原因是我最近悟出来的。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我不同意“央行发货币就等于发股权”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知道，上世纪 70 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全球真正走向了储备货币或者信用货币时代，这个信用货币是不可兑换的。70 年代以后全球贸易增长是非常快的，这跟主权货币跟贵金属脱钩是有很大关系的，央行的余地很大。

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伯克南是专门研究金融危机的，又对日本特别关注，他就认为 30 年代金融危机时的政策是错误的，没有放松流动性，应该大量放松流动性。现在从结果来看，QE 大量放松流动性还是起作用的。我最近刚好看了伯克南去年一个两万多字的文章，他完全是为美联储辩护的。当然他定义得很清楚，什么叫 QE，QE 就是增加银行的准备金，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资产。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只能买国库券，其它央行可能限制更少，可以买私人的其它的股权。他认为 QE 是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市场的，一个是信号效应，就是通过注入流动性，购买资产，对市场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我是认真的，你们不要太惊慌，这是一个信号。还有是资产组合的渠道，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有各种金融

资产，但是可能不是很匹配，由于注入了资金，可以使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能够更好地匹配。

我春节也看了两本书，其中一个让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我们常常说央行发货币，它到底怎么发的？我们以为是印钞票，前两年伯克南当道的时候，国会议员就问他了：“主席，你说购买 QE，购买资产很好，你的钱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纳税人钱交上去，你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伯克南说：“不是，这个钱就是我们央行通过计算机打到银行里去的。”你仔细想，是这么回事情，这个钱对我们个人、对于企业来说那么斤斤计较，看得那么重，但是央行现在也不印钱了，就是电脑当中输入一个数字，这个钱就是这样出来的。

徐明棋也讲了，前一阶段有一些争论，货币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其实两者都有，内生是有，银行通过贷款创造流动性创造货币，但是像他这样是完全外生的。伯克南看得那么透，当然因为他是学者，做大量的研究，一般没人敢大胆地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学派做的更远，认为中央政府根本不用收税，当然这个可能走得更极端了。他们提出，对于实行浮动汇率的中央政府不需要税收，就是印钱，因为印了钱可以使企业能够有钱，个人有钱储蓄，当然这是有争议的一个说法。我个人觉得，我们对于主权货币的研究是不够的。当然我不是说鼓励乱发钱，毕竟有很多限制，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资产价格等。伯克南讲了，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资产泡沫，他讲了很多，当然他这是为自己辩护，你们可以看一看他讲得有没有道理。国会议员写了很多信，担心资产价格泡沫。他回答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可能滞后效应是十年二十年，

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至少没有看出来。何知仁讲到资产价格，我们平时一般认为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当然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我总的感觉是，恐怕我们对法定货币或主权货币的性质，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还要做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现在讲的比特币，包括委内瑞拉所谓的石油币。媒体上大呼石油币了不起，是第一个法定数字货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个石油币不能换石油，只是抛了救生圈想救求自己，能不能救还是一个什么问题。你想想看，他欠了人家那么多钱，有些都是拿石油做抵押的，他都还不起钱，现在发的这个货币是不能换石油的，你的信用在哪里？别人为什么要买你呢，他就是鼓励人家来投机，现在买打6折，以后什么时候买打7折，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数字货币。当然它可能用了区块链的一些技术，可以去查账户，查资金的进出，但是我觉得都没有用。

另外，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说央行货币超发，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好，这个结论对还是不对，当然资产负债表增长的比例可能比美联储还多。

王红林：货币超不超发，用欧央行的角度就一个标准——通货膨胀。从技术角度来说，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多少钱就是加几个零的问题，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是授信给你，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授信加多少个零都可以。但问题是什么？我前阵子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也经常想，中国政府也发了很多货币，你可以不停发下去，发到最后一根稻草让经济体系崩溃是一个什么问题。

徐明棋：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津巴布韦。货币发行在本国就是央行对经济体的负债，负债当然可以增加可以收缩，但

是有界限，必须和本国的经济活动相适应，除了商品交易，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资产交易，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度。

王红林：我同意你的观点。衡量是不是货币超发就一个标准，通货膨胀。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复杂性：第一是现在不通胀不代表未来不通胀，也许十年二十年后会出问题。第二个要不要把资产价格考虑到里面。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你就发好了，如果你能很好地衡量通胀，而且保证通胀是比较平稳的话，你盯着通胀率，只要是货币发行导致的通胀率还低于2%你就不用担心，中央银行接着可以在里面加零，加多少零都没关系，因为那代表着你的供应是不断增长的。

徐明棋：这个又回到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问题是货币的运行、流动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一直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

王红林：我认为美国2008年就是没有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如果把房价考虑在内不会这么加息的。

徐明棋：所以伯南克讲，我在经济收缩期间把货币放掉，后面的结果交给耶伦了。

王红林：美国加息的步伐是非常难的，加的太晚资产价格太高，美国股市开始调整，这里就是很难判断经济体到底多活跃，因为很多东西是内生的。

徐明棋：这就是复杂性，而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经济周期段，未必完全重复之前的规律，还是要根据现有的情况，货币政策的调整要适应当时的经济运行，这也是对所有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掌控者提出的挑战。这实际上就是货币政策始终必须要研究，而且有研究价值的所在。否则按照最简单的规则，现在计算机那么发达，回归一下就行了，

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王红林：经济体里有很多的摩擦力，到底货币在经济体里是怎么内生性地让其它东西发生变化，反过来影响货币政策，这里面的反馈是一个复杂系统。经济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回归，那对复杂系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看到的事情就像盲人摸象，这个人上去摸到的是这个平面，那个上去摸到的是那个平面。但是经济体整个是复杂的动态系统，DSGEModel 模型太简单，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动态，在经济学上很难有手段。最后还要线性化，求一个均衡解。

我不是说 DSGE 模型有问题，但是它的复杂性远远赶不上经济体的复杂性，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做非常复杂的模型才可以。这个时期这几个因素是主要矛盾，下个时期可能那几个因素是主要矛盾。对中央银行决策者来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做。我不可能设定一个预先的步骤，告诉你今年加 3 次，明年加 4 次，这是不可能的，都要看情况，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徐明棋：你刚刚讲的这点，让我想起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一个争论，就是商业银行要不要搞储蓄？后来负债业务成为最主要的业务，抓存款是非常重要的。从宏观角度来说，为什么抓存款？因为货币沉淀在下面，没有钱用了。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中央银行授信给各家分行，授信下去货币就来了。问题是沉淀在经济体里的货币，一旦活跃起来就不得了，后来说是笼中之火，要把这个火圈起来。沉淀在经济体里的货币一旦加速流动的话，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整个货币供应量就增加了，这个时候央行再收缩就晚了。

王红林：我们研究货币政策的人总是想价格和数量，这

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原理上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两个是有点脱钩的。中国人民银行是不是可以完全依靠数量工具就做很好的货币政策调整？我们过去就是靠 M2 或存贷款规模调控。发达国家都是价格。数量只看到了供给面，因为你看不到需求是多少，价格是反映需求和供给的，所以两面都能看到，这说明价格是比数量更敏感、更容易观察到的东西，但是价格里面又有复杂性。

徐明棋：这里还有不同的阶段。经济运行正常阶段，价格比较敏感。经济危机来临或经济收缩的时候，货币政策又开始向数量的政策工具倾斜，量化宽松就是数量工具，价格已经不能刺激经济主体。

王红林：观察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有一个那端的例子，高通胀的时候，价格工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利率调整跟不上通胀，所以还是用数量工具。在经济太低太高的时候，价格都是不行的。

徐明棋：沃尔克在后期就是用价格，把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几，因为有严重的通胀，要把通胀先压下来，光靠数量工具就不行了。

王红林：还是用先紧缩。

徐明棋：危机之后的基本趋势是两个工具都变得非常重要，需要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

王红林：我跟老外说，QE 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更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更经常用的东西，就是拿钱直接买资产，改变收益率曲线，中国最爱干这个事了。咱们把国债利率曲线和存贷款利率曲线定的死死的，就是把价格定在那儿，原来利率管制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徐明棋：QE 与传统的货币政策相比，比较明显的区别

是在公开市场上事先向经济主体宣示，我有多少数量的基础货币要注入进去，而不是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是见机行事，我觉得这周的流动性见底了就放一放，下一周看到不行了就收一收，事先是不告诉你的。QE 是长期明确的宣示的数量，实际上内在机制和公开市场是没有差别的，放出债券就把货币收进来了，QE 因为后来债券买的都够了，就直接买准政府机构的债券，像美国就是住房抵押做担保的债券。

王红林：在货币政策理论里，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到底要盯住短期利率还是盯住长期利率。按理来说我们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的是长期利率，但是中央银行要调节的是短期利率，为什么会是这样？

徐明棋：理论上说中央银行不直接掌控长期利率，必须要在市场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影响长期利率。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央行通过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的效率下降了。

王红林：传导失灵了，跟中国一样传导失灵了。QE 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直接压低长期利率。

徐明棋：2004 年还是 2005 年，我去美国参加一次会议，当时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说美国现在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间出现了扭曲，然后就怪中国。我就在会上争论这个问题，怎么能怪中国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出这样的问题。

王红林：实际上中国现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蛮大的，首先你去看美国的 CPI，在 90 年代之前贸易品和非贸易品趋势是一样的，都是缓慢上升。90 年代以后非贸易品上升，贸易品要么平了，要么下去了，为什么？来自中国的供给冲击，不一定是中国的，包括来自全球的供给冲击，这对货币政策也是很大的影响。

徐明棋：简单讨论金融得不出很大的结论，还是要放在很大的背景下，整个经济运行出现了很多明显的变化，包括全球化，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程度那么紧密，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无法忽略的。

王红林：我还要讲一个观点，美国对华赤字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元。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你想想任何一个经济体有那么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货币会贬值到什么程度？这是根本原因。要么美元放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是他们又不愿意。

乔依德：特朗普是一个商人，现在很多政策建立在错误的想法上。

徐明棋：也不一定是错误，特朗普现在是有恃无恐。

乔依德：克鲁格曼写了一篇东西很有意思“为什么商人不能成为政治家？”商人和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闫彦明：美国把 TPP 踢开，已经感到被动了，特朗普重新关注怎么再引导 TPP 的发展。

王红林：中国过去一直压低汇率，导致大量的贸易出超。你的货币超发，然后你收回来，但是这个是不充分的，现在造成资产泡沫上来，损害了竞争力，最后全球贸易不平衡，中国自己也是受害者。最好大家都按照同样的规则，美国人受害是工人阶级受害，但是有些部门是得益的。中国受害的是老百姓，付出很高的房价。

徐明棋：调整迟早要来，必须会来，只不过是哪种方式。逐步恢复稳定，还是政策调整形成冲击，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乔依德：这一阶段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如果没有我们暂告一个段落。

闫彦明：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的货币和经济处在比较微妙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基本上比较明朗地出现了增长的新苗头，包括欧洲、美国，宏观经济数据都还是非常好的。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是好于目标，所以 2018 年的形势总体比较看好。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处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我们看到最近西方国家对于人民币崛起有一定的恐慌心态，近期新华社内参有提到。

王红林：千万不要看记者写的内参。

闫彦明：有一些数据还是可以参考的。据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前不久统计的数据表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最近几年不显山不露水的已经有 60 多个国家把人民币纳为储备货币，客观上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非常重要的阶段。这对美元、欧元的传统格局有比较大的冲击。根据去年统计的信息，中国整个实体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可能超过 30% 的水平，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走强，一方面是在货币和汇率方面的变革，未来一段时间对于全球经济形势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刚刚提到量化宽松，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一定的量化宽松。我们通货膨胀的统计指标跟国外有很大的区别，大量的房地产泡沫作为现在的蓄水池没有体现到物价水平里，加上这因素个，通胀还是非常严重的。对 2009 年的 4 万亿计划存在争议，货币供应过快的大幅度增长与波动，对整个宏观经济，特别是对企业部门是不利的。

中央银行也在不断探索货币政策的调整，跟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逐渐退出进行动态博弈，在工具上也试图做很多创新。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利率出现了双轨制，这个状况

是比较客观的存在。基准利率连续多年没动，但是宏观经济又需要找到一个市场定价的基准，这个基准从哪里来？这个要到市场的供求关系找线索。另外是货币政策传导途径，除了利率的传导途径，还有重要的途径是通过资本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对短期利率有一个市场化比较明显的机制，中长期更多的要考虑不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这些都是相对具有客观特征的价格指标和信号。在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基本不动情况下，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时候，他们主要参照了什么价格？近期我们对银行业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实际上他们各自有一套计算模型。这个标准我们看了一下，各家银行不太一样，而且是不对外公布的，各家是黑箱操作的状态，所以整个市场上的价格是比较混乱的格局。

王红林：国债价格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成为主要的定价标准？

闫彦明：你讲的是很关键的问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跟人民银行与中国金融结构体系有很大的关系。

王红林：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能买国债吗？现在谁能买国债？谁能参与到国债市场的交易上？

闫彦明：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的。现在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数量超过两万家，包括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信用社。

王红林：持有者分散的话，按理说应该还是比较活跃的，现在波动性够吗？

闫彦明：二级市场中的回购交易比较活跃，价格总体在区间内波动，不同产品的波动率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涉及到几位专家说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倒挂，出现 M 形的曲线，短期的高于长期的价格。

王红林：原来我和马俊写的文章叫“利率传导机制的动态研究”，我们自己写了一个模型来研究利率传导的机理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讲，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金融主体，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当货币政策外生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去调整其资产配置，而导致各个金融市场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动，这种东西就叫做利率传导。所谓的利率传导不通畅，实际上是套利机制不够灵活，在各个市场和各个曲线之间的套利有很多障碍，所以利率传导不顺。传导不太好的情况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像美国那样发生金融危机出现倒挂。另一个原因是曲线之间的套利和市场之间的套利有很多障碍，市场没办法做套利，所以会出现异常的现象。要把那些障碍去掉，让大家比较自由地套利，才能实现一个比较健康的、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利率曲线，这时候你的利率曲线才能作为市场的一个定价标准。

闫彦明：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也是分割的，既有银行间市场，也有交易所的债券市场，还有一块是柜台市场。柜台业务是老百姓可以买的，只有老百姓可以参与。

王红林：市场分割使得市场的摩擦力还是太多，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

闫彦明：同一个机构要在不同市场开户，导致了市场的分割。

王红林：套利是好事，没有套利就没有货币政策传导。

闫彦明：为什么国债价格始终没有成为货币政策或整个金融市场的定价基准？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商业银行的渠道来传导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通过 MLF、SLF 等工具直接跟大银行定价。

王红林：那个是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闫彦明：其中也有定价的问题，比如说 MLF 等操作过程并不公开，怎么定这个价格，而且是作为货币走廊的上限。

王红林：这个货币走廊还搞不搞？原来孙国峰是很喜欢搞的，李扬就坚决反对。

闫彦明：李扬比较反对这个货币走廊。再一个是对实体经济的主导性体现得不是特别充分，所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定价还没有成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渠道。

乔依德：你们现在推的是三个月期国债利率？

闫彦明：我们有一个中债金融估值中心，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在去年反复比对的基础上经过理论论证，认为找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利率的“锚”，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王红林：有一个问题，央行是不能控制十年期利率的，央行能控制的一定是短期利率，没有办法控制通胀预期。

闫彦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更多的是聚焦在短期。

王红林：理论上讲，当短期利率变动，长期利率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反过来调节长期利率，短期利率会有大幅度的波动。各国央行都不能定位在长期利率。现在中国央行怎么把欧洲和美国的机制融合在一块？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欧洲的，但是你想选美国的做法，怎么找平衡点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要选美国，就用国债市场作为基准；如果你要选欧洲，就用银行内部的或者最优什么的作为定价利率。但央行一直没有拿出说法。

闫彦明：我们最近刚好跟几家银行合作，也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他们觉得定价模型操作起来还是有问题的，也不完全可靠，所以他们参考国债收益率不同曲线的组合，形成

一个模型。将来的一个趋势是，银行渠道的定价机制和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还是要向集中化靠拢。央行这边和我们做了大量的交流，去年比对了一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在3.61—3.79区间，在窄幅的波动区间，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作为市场的定价的“锚”。

乔依德：可能央行还没有表态。

闫彦明：还处在探讨的过程，因为银行定价的机制，在理论界的争议还是比较多的。

徐明棋：央行现在仍然规定了利率上下限，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

闫彦明：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徐明棋：西方国家央行有一个所谓的政策利率。美联储有两个利率，一个是基金利率，一个是存款准备金率，大概相差0.25到0.5的水平，然后调整，因为这个是央行可以调整的。现在央行规定了存款的基准利率，又规定了贷款的基准利率，利率的上下线就定下来了，说句老实话，某种意义上，这对竞争有扭曲性的影响。

闫彦明：所以现在各家银行业在探索能够真正反映市场关系的定价模型与标准。

徐明棋：金融自由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多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下线有点名存实亡了。你看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往上跑的，因为所谓的理财产品突破了存款基准。贷款由于垄断性行为的存在，又是通过附加各种手续费，贷款利率实际上是往上跑的，整个金融成本是有一定的扭曲的，市场没有充分的竞争。我们现在也无法一下子过渡到所谓的量化的货币政策，因为有刚性兑付，又有国有的背景在这儿，国有企业根本不怕破产，对信贷始终比较渴

望，超过它的能力，市场的风险定价又是扭曲的，无法准确地把这部分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信贷风险充分反映出来，因此整个金融市场不断扭曲，最终反映到宏观的体系上。

闫彦明：银行利率的传导过程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大银行拿到的利率水平是非常低的，一层层传下去，传到中小银行，又传到非银机构，最后才传到实体经济领域。大企业有很强大的定价谈判权，可以直接和大银行谈贷款价格，所以能锁定很低的利率水平。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这个低利率的资金。

从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来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加速开放，债券市场虽然开放晚于股票市场，但是开放速度快于股票市场，目前进入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外资机构已经有 600 多家，去年底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的余额接近 1.1 万亿元。

徐明棋：所有的外资都是在你们那里开立账户？

闫彦明：在我们这里开立投资账户。

徐明棋：属于专用账户？

闫彦明：属于这一类的。跟自贸区的又不太一样。银行间市场的开户同时涉及到资金结算，必须在我们公司开户。债券市场开放必然会带来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跟境外市场的联动性显著增强。现在各类的机构投资者只要符合规定，都可以投资债券市场，未来债券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跟国际市场联动的非常重要的载体。各国投资者投资到一个国家，首选的是高信用等级利率债。中国主要是买美国的国债。我们国内的债券收益率在多大程度上跟国际市场是能够联动的。这带来我们的市场定价问题，因为国债利率跟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未来是重要的研究点。将来中国通

过债券市场跟美国金融市场存在更多的互动，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丁剑平：听了前面专家的想法，我也高度的同意，今年到 2020 年是大起大伏的金融市场，肯定不会平稳，为什么是大起大伏的金融市场，我的判断十年诅咒并不会去掉，主要是由于对人工智能的潜力的创新估计，对金融周期的影响，这次的金融周期跟以往的金融周期最大的区别是大数据下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把这个周期规律彻底的扭曲了，也就是打乱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所预想不到的。因为有高科技的支持，所以这个问题能支持这个市场保持很乐观，但是我们讲，高科技的支持的新周期的持续发展，可能又带来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失业率的加速。

高科技和失业造成两极分化加重。财富在全球财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最近在委内瑞拉等国家，爆发动乱的问题很多都跟失业有关，科技公司越来越垄断，并非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垄断这种趋势在短期内似乎平稳，但在相当长期的时间内可能继续发展，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大，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中国的扶贫脱贫政策如果做得好能够稳定市场，但是全球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中国是其中之一，中国的高科技也在迅猛的发展，高科技迅猛的发展，对金融周期的转换、变化影响很大。同时全球的这种收入的两极分化对中国的冲击也会有，这两面就会把整个金融市场搅的很乱。

因为货币政策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特朗普团队里面没有专门研究货币政策的，美国将来可能更加倚重的是货币政策，因为经济周期是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然后通过财政政策把财富再分配。为此，到 2020 年财政政策影响力越

来越大，货币政策影响则越来越小。因为要考虑实体经济，这次金融经济周期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周期，一定要把最关键的实质东西考虑到，什么样的经济周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经济周期，潜在的发展潜可能不可预测，同时造成了财富的两极分化，造成世界更加容易崩盘。然后货币政策弱化以后，财政政策怎样发挥效能越来越重要。财政政策最典型的就是根据某个产业某个地区分别做政策，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难施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在做各方面的准备，有正对性区域化扶贫、脱贫的政策，但是这些都是要靠大量的财政做准备，并且要考虑到可持续性的问题，钱拨下去容易，吃掉了又没了，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又要靠货币政策的支持，这是我对刚刚几个专家论点之后的看法。

经济周期要看准这次经济周期的特征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大于货币政策。美国这方面很清晰了，未来财政政策远远大于货币政策，看美国的减税等等效益出现，这样的话美国就业问题解决了，分配问题也解决了，社会就平稳了，如果社会不平稳，两极分化肯定会引发动乱。出现南美这些问题也会在其他地区大量爆发。

再看人民币汇率和其国际化，现在的中国汇率政策出现自相矛盾的问题，中国去年提出了“逆周期性因子”，过了几个月取消了逆周期性因子，这个政策一出现当年又取消了，“中间价”功能一会儿强化一会儿弱化，出现“逆周期性因子”就是要把“中间价”弱化，这两个又矛盾，老是出现矛盾。许多专家讲中国货币政策要朝着市场化发展，同时又强调人民币稳定，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都是有矛盾的，

都是一个个悖论。这些问题出现的背后是，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币的浮动相对什么浮动？

我们现在走的一步是参照篮子的货币汇率制度，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货币政策主要的是瞄准物价，接下来汇率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稳定国内的物价而服务的，那么我们的汇率在通缩的时候怎么能把他国的通胀引进来，要么把本国的货币多发；通胀的时候怎么能瞄准自己可控的商品，中国过去碰到危机的时候，控制不住的时候重新盯住美元，今后的几年当中，重复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国，还没有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国，碰到危机时候又是重新盯住美元。盯住某个国家的货币，肯定是小国的汇率制度，没有哪一个大国的汇率制度是盯住一个他国的，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再看日本，日本的货币政策不独立表现在该把通货膨胀引进来时候则引不进来，该通胀的时候通胀不起来。为此，根据本国的经济周期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盯住不盯住的篮子货币或可控商品价格问题。

大国货币相对谁浮动？我们现在走一步看两步，未来要看到后面几步，现在是第二步一篮子货币，接下来可控的商品，因为再盯住美元又到第一步了，未来可控商品还要符合科技革命经济周期。作为货币背后隐性锚的黄金、石油等随着科技革命发生了价格颠覆，诸如页岩油替代石油，黄金采掘技术革命等。本国的科创周期显得愈加重要。美国替代英国是靠科技、GDP等实力上去的。科技上去了就成功了，科技上不去，想称霸也称不了霸，全球货币“隐性锚”的未来都在以科技革命为国家货币政策周期的参照物，所以参展本国的科技周期才有自信，货币汇率才正真独立。

从现阶段来看人民币和新加坡货币一样的，是参照的。只是比单单盯住美元好一些，这些都是一个过渡期。接下来我们盯住中国可控的大宗商品，这个也是过渡期，走一步看两步，未来还是要靠中国可控的大宗商品，中国黄金在世界第二位，为此出现了“上海金”、石油期货人民币计价。接下来中国可以相对脱离美元，因为人民币后面有黄金。接下来我们石油期货用人民币定价，等等一系列的，但是这不是最终的。

未来的科技革命的周期，经济周期并非是大宗商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最终点，最终点还是要让一带一路区域货币参照人民币，背后是中国的科创周期，也就是中国的科技革命作为支撑，汇率政策符合顺应中国科技革命周期，这个周期里面就含了各种因素，根据各种因素确定人民币的汇率，走一步看两步，从盯着一篮子货币，可控大宗商品，后面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以科技革命为特征的经济周期。

乔依德：你从人民币的角度。前面阎总是从债券的利率，利率市场化的角度。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一是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一般认为已经复苏了，但是还比较疲软。二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做？可以说得宏观一点。国内的金融市场改革，浮动汇率现在是不是到时间，汇率体系改革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进？前一段时间也讲逆周期因子拿掉以后，央行外汇管理局对人民币汇率没有很大干预了，有这个说法。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放开？国内利率进一步市场化，利率走廊、收益曲线这方面能做什么？包括现在对美国我们讲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是不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者现在不能

推进？2012-2013年央行说2015年基本上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十九大”报告对这个事情和十八大三中全会提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不提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徐明棋：“十八大”和“十九大”在金融领域有两个最重要的不同，一个是不再提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另外不再提推动银行债券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加了一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现在进入新阶段，原来积累的风险可能在新阶段有所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可能不是推资本账户开放的最好时间段，包括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

当时说先放汇率再开放市场，但汇率和市场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在有严格资本账户管制和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实现汇率的浮动。相对比较自由的是经常账户的供求关系，而资本账户的供求关系总是要管理的，管理只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交易的管理，一个是外汇兑换的管理，现在两个管理都存在，操作经常账户需要的外汇兑换也是有管理的，汇率无形地被干预了。

所以我认为短期内以稳为主，渡过经济下行结构调整所释放的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我个人觉得也是必要的。再加上外部环境，美联储在收缩，欧央行将来也收缩，一收缩金融市场就会振荡调整，会重新在全球对风险进行定价。所有金融产品的价格都会发生调整，一定会导致所有投资者在选择不同资产的时候出现调整，必然导致资金在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资产上的调整，我们必然要防范。

在中国现有的大背景下，我们四大国有银行能力相对强，其它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不具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

力，必须靠管控给它制造屏障。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政府对前一阶段海外并购搞得风生水起的几个大机构进行处理，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不要看它买买买，它一端是资产增加，另一端是负债的，负债的规模和资产扩张是相适应的，一旦人民币的国内负债与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相对价格变动时，就变成资不抵债，资不抵债最后的风险是国内担保的银行承担的，很多是通过内保外贷的形式借的钱，购买了很多，一旦国内欠的账没有办法通过资产运营获得的收益弥补，马上出现流动性的问题，资产可能价值收缩，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万达就是因为流动性出了问题。

因此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汇率自由浮动，适当地放缓脚步，然后通过逐步理顺市场关系，通过竞争让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得到提高，那个时候水到渠成的开放可能会好一点。

丁剑平：我部分同意。我们在服务业上可以开放大一点，最近增加银行业四个开放许可已经扩大了，机构性的服务业，包括其它的国民待遇尽量朝着世界统一标准执行。但是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可能不宣布什么具体东西，可以做起来再说，“摸着石头过河”，诸如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探索。在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状态下，只能采取目前的做法，做归做，但是随时可以退，因为大势所趋不得不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对等机构服务业开放。服务业开放早晚会涉及到人民币业务，人民币等业务方面的可以部分做起来，不宣布，采取这种方案可能是对待目前的情况和 2020 年之前可能出现金融市场大起大伏的最佳策略。

闫彦明：第一，我觉得现在探索推行的双支柱新的货币

政策的一种框架，这是一种比较主动作为的一种策略。特别是“一行三会”去年以来密集出台大量的相关政策和文件，意图实际上就是来加强宏观审慎的管理。

特别是金融领域，前两年放得比较开，包括同业业务，包括理财产品，遍地开花，导致了大量的资产错配，这边的利率相对看得见，比较可观，导致了社会资金的循环出现了扭曲，通过推行双支柱主动地降低金融业“去杠杆”，对未来稳定发展将带来积极的作用，接下来还是持续的推进。

包括今年有一些非标资产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大量的非标政策可能未来转到标准化市场交易的格局上，对加强金融监管也是比较有利的趋势，通过收缩银行业的泡沫，对未来我们国家持续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第二，前面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重要前提还是在于利率的市场化，很难想象国家货币在没有市场化的前提下大规模开展国际化，本身就是很难，出现了价格上的扭曲状况。国外比如说投资到人民币的资产，到底以什么来为定价依据，是看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看市场内在供求决定的价格？我觉得虽然形式上中国已经把存贷款上下限全部放开了，但实际上操作中尚未达到利率市场化的真正状态。

我们最近也不断地向央行等主管部门呼吁，加大对于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的关注度，而非仅侧重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利率传导的途径，要更加注重金融市场定价。这个渠道，我们将它理顺，通过各种价格的比对，找到最能够反映中国金融市场供求关系的利率基准。

也有关注到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因为 SHIBOR 是作为一个比较短期的价格指导，对于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对中长期是相对比较失效的。后来

IMF 也是反复比对，还是决定用国债收益率来做一个基准。

但是我们研究中发现，各个市场的价格包括信贷，银行定价的价格基准，及债券市场本身的价格基准，十年期的国债都处在相对窄幅的区间波动，本身也是市场买卖决定的，窄幅区间振荡，总体上能够比较好地发挥利率“锚”的作用，未来人民银行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可研究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利率价格的“锚”，这为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的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基础。

再一个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我们从金融危机以后的经验来看，我们的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的管制，恰恰是我们比较少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原因。近些年来做的已经比较多，实际上我们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也持续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人民银行去年出的报告）提出来我们 40 个人民币可兑换的子项目，其中有 37 个实现了可兑换、可基本兑换、可部分兑换等，只有 3 个是不可兑换，但是这个进程还是像前面几位专家讲的，要在国际化进程中，牢守自己的风险底线前提下推进市场开放，从这个角度看资本项目管制未来一段时间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蕊：说到资本账户开放，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金融环境，都不是最好的时间窗口。

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一个是万达的海外并购，还有一个是安邦，他们都是大手笔在海外进行资产购买，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王健林折腾了一阵子基本上稳定了，安邦直接被接管。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简单讲，他们都是负债是人民币化，资产是美元化。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万达更多的是资产的问题，安邦这边更多的是期限错配的问题，借短买长，肯定是很大的问题。李书福收购戴

姆勒奔驰专门强调，这次的收购全部用的是在海外的资金，这个没有作为很重要的方面进行渲染，但是仔细观察的话，实际上这里面有微妙的关系。

之前的人民币贬值给外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前说我们的外储多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这个话在人民币贬值阶段再也听不到了，销声匿迹了。事后来看的话，我们对外储还是有一定管控能力的。目前来看，担心外储下行的这根弦还是没有放松。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不是最佳的时间窗口。

乔依德：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头，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报告，还要请大家提提意见。这个问题很重要，无论从现实或长远的角度，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们国家对外投资的风险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也在研究，重要的是从政策的角度要有一个连贯性。现在有些海外投资不允许，有的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房地产一刀切都不能投资，为什么房地产都不能投？当然那些转移资产的一定不能投。有的变化对企业家是影响很大的，因为以前出去也是通过批准的，现在一刀切，比如王健林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要有一定的一致性，现在不支持可以，但以前支持出去投资的总归还要保证的。

我就不多说了，刚才大家讲得很多，我们以后研讨还会再继续，当中有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谢谢大家的参加。